

滿鐵研究

[Http://blog.sina.com.cn/mantieyanjiu](http://blog.sina.com.cn/mantieyanjiu)

2015 No1



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满铁资料研究分会

目錄

Contents

- 01 墨守成规与班门弄斧 许 勇

簡訊

- 02 《满铁调查》中文版发布会在京举行 许 勇

論壇

- 05 满铁与《满洲日日新闻》的创刊 谷胜军
11 “满洲医科大学”侵略罪行研究 王玉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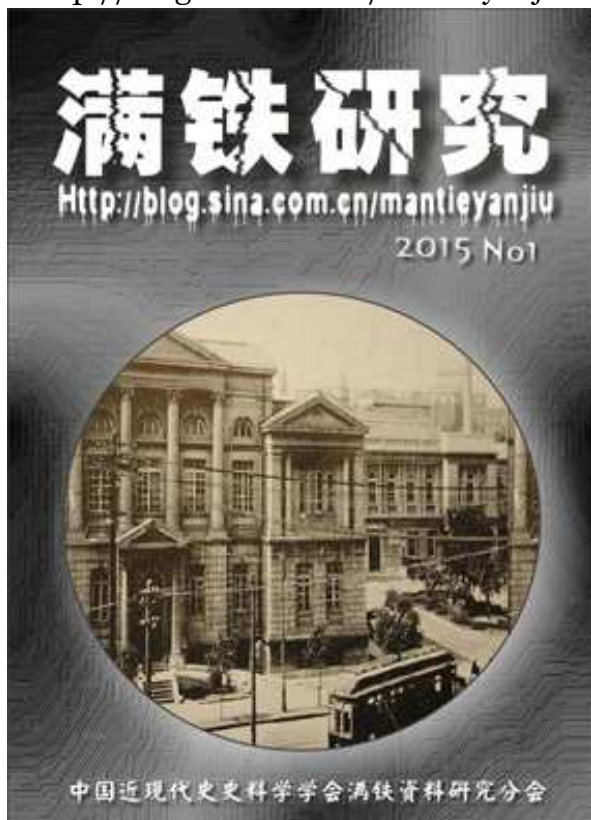
文摘

- 19 论日本对中国东北移民的侵略本质
28 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中国叙事”再考

圖庫

- 37 “满洲之妖”甲级战犯岸信介
49 《满铁调查》中文版发布会撷英

<http://blog.sina.com.cn/mantieyanjiu>



滿鐵研究

MAN TIE YAN JIU

《满铁研究》编委会

主任：张星臣 魏海生

顾问：国 林 葛剑雄 张本义

沈友益 李海绩 李东翔

编委：张星臣 魏海生 韩宝明

郑 兰 刘建设 许 勇

主管：满铁资料研究分会

主办：北京交通大学图书馆

主编：韩宝明

编辑：《满铁研究》编辑部

邮箱：mantieyanjiu@163.com

地址：北京交大图书馆 611 室

邮编：100044

期次：2015 No1（总第 25 期）

日期：2015 年 3 月 28 日

网址：lib.njtu.edu.cn/mt/mtyj.html

版權聲明

《满铁研究》刊载之文字和图片，其版权归作者所有。凡转载、摘编本刊内容，请注明“转载自《满铁研究》”，并按规定向作者支付稿酬。否则本刊将追究违反规定者的法律责任。

徵文啓事

《满铁研究》是一份由中国近现代史史科学学会满铁资料研究分会主管，北京交通大学图书馆主办的史学季刊。传递信息、交流学术，揭示历史，畅想未来是《满铁研究》的办刊理念和既定目标。本刊设简讯、动态、特稿、书评、史证、文摘、论坛、图库、译林、杂俎等栏目。欢迎海内外满铁研究领域的专家和爱好者为本刊赐稿。

執行主編：許勇

墨守成規與班門弄斧

「《滿鐵調查》中文版學術研討及新聞發布會在京舉行」，發布會由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聯袂主辦。儘管華師大的農村研究院不是滿鐵資料研究分會的會員，但是，以徐勇院長領銜的研究團隊卻能腳踏實地、精誠團結，做了諸多甚至連會員都未能落實的事情。《滿鐵調查》中譯本第一輯的成功付梓，是國內滿鐵史研究領域的一件盛事，它的意義不僅體現在能為日語的生手提供閱讀方便，更體現在能為天橋的把式樹立學習榜樣。

「滿鐵與《滿洲日日新聞》的創刊」是從文化的視角，對滿鐵這個侵略怪獸的深層解讀。創刊於1907年的《滿洲日日新聞》，不單是滿鐵的機關報，它還是日本政府的喉舌。滿鐵首任總裁後藤新平的一系列強盜邏輯和歪理邪說，諸如“文攻武備”、“比目魚的眼睛”、“攻心”，以及侵略者的所謂“大東亞共榮”、“王道樂土”，大多是通过《滿洲日日新聞》這類宣傳平台散布出去的。

「“滿洲醫科大學”在中國東北侵略罪行研究」從文章的題目看，似乎與滿鐵無關，其實不然。首先，作為殖民統治的重要手段和策略，醫療衛生始終被日本殖民當局所重視。學醫出身的滿鐵總裁後藤新平，更是深諳此道。其次，滿鐵設立之初，便在地方部內設有衛生課。1911年，滿鐵在奉天創辦南滿醫學堂，1922年，經時任滿鐵總裁早川千吉郎申請，醫學堂正式升格為“滿洲醫科大學”。這所日本人掌控的醫科大學，在滿鐵存續期間，到底是如何“救死扶傷”、“教书育人”的呢？請詳閱該文。

「論日本對中國東北移民的侵略本質」出自吉林大學東北亞研究中心三位教授之手。自“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先後向東北派遣了30余萬移民。這種移民侵略，不僅是日本帝國主義佔領中國東北進而實現大陸擴張政策的重要組成，還是上升為“國策”地位的战略行為。1906年，有人就提出10年內向滿洲鐵道移民50萬日本人的計劃，此人正是滿鐵的第一任總裁後藤新平。不僅如此，日俄戰爭後，日本最早的試驗移民點也是設在旅大以及滿鐵的附屬地。

「夏目漱石、芥川龍之介“中國敘事”再考」提及了兩本書，即夏目的《滿韓處處》和芥川的《支那遊記》。夏目漱石與芥川龍之介皆為日本知名作家，1909年，夏目應老同學老朋友中村是公（時任滿鐵總裁）邀請，赴滿洲參觀訪問20余日，返日後發表了遊記《滿韓處處》。1921年，芥川作為大阪每日新聞社海外觀察員來華觀光視察，歷時三個月，遊遍上海、杭州、南京、漢口、洛陽、北京、天津等地，1925年，《支那遊記》出版。兩個日本文豪寫的中國遊記，儘管年代、地區不同，但有一點師徒倆是完全相同的，即對“支那人”的輕蔑。

「“滿洲之妖”甲級戰犯岸信介」是一組老照片，主要人物是岸信介。看過這些黑白寫真，自然會想起中國一句老話：上梁不正下梁歪。近年來，在處理國際事務尤其是中日關係上，安倍晉三煽風点火、上跳下竄、頤指氣使、神經兮兮，“滿洲之妖”的遺傳基因在其外孫的身上显现的可謂是淋漓盡致。

華中師大中國農村研究院的精英們，劍走偏鋒，獨辟蹊徑，譯成《滿鐵調查》，讓編者不由得想起戰國時期的兩位魯國人，墨翟和公輸般，以及兩個相關的成語，墨守成規與班門弄斧。但愿中國的滿鐵研究，少些墨守成規，多些班門弄斧。



《滿鐵調查》中文版 學術研討及新聞發布會在京舉行

許勇

2015年1月23日，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城市治理研究院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联合主办的《满铁调查》中文版出版发行学术研讨及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国宏大厦举行。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南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满铁史研究专家以及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新闻社等20余家媒体记者莅临参会。中国农村研究院执行院长邓大才教授主持研讨及发布会。

首先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的刘义强教授对《满铁调查》中文版的出版情况作了简单介绍。刘教授指出，中国农村研究院长期致力于中国农村政治、经济、历史和社会文化等实地调查和实证研究，深知《满铁调查》系列资料的重大历史与学术价值，该研究院克服重重困难，将编译工作纳入攻坚工程，以期为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民俗学以及农村问题研究等诸多领域提供严谨、翔实的参考资料，挖掘满铁资料的深度价值。

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日语系主任李俄宪教授代表《满铁调查》翻译组向与会人员介绍了该书的翻译概况。李教授简单回顾了2010年接受翻译任务以来遇到的各种难以预料的问题，如日语俚语、字迹模糊等。面对困难，50多人的翻译团队本着扎实、严谨的风格，几年如一日勤勉工作。在基础资料翻译的前提下，翻译团队不仅邀请日本专家参与校对和审核，还定期举行交流和培训活动，以推动翻译工作的高质量进行。看着摆在眼前业已付梓印成的《满铁调查》第一辑，李俄宪教授激动万分，他表示，满铁调查是日本帝国主义为发动侵华战争而准备的，其观点、所用术语都有其强烈的侵略目的，这是我们坚决不能认同的。然而，考虑到《满铁调查》毕竟是翻译作品，故在翻译过程中，尽量保留了其原本表述，一方面是翻译作品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读者认清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本来面目。如今《满铁调查》的翻译工作已经从最初的项目型、任务型升华成自己的一种事业追求，翻译团队将认真总结前期经验，不断改进和提升方式方法，力争未来翻译出更高质量的中文译本。李教授语重心长地说：“中国是个巨人，可是通过满铁调查就能看到，中国在日本这个“小人”面前曾经是裸体的巨人，而我们对日本又了解多少呢？日本在我们面前仍是个神秘的小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赵剑英在发言中对中国农村研究院的学术研究和布局给予肯定，他指出，在缺少经费资助的不利条件下，中国农村研究院能牵头《满铁调查》的编译并持之以恒，其执着精神难能可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将继续把《满铁调查》作为重点图书予以出版推介。

华中师范大学科研部社科处李华中副处长就学校重视、经费保障和协调服务三个层面重申了华中师范大学将对《满铁调查》今后的编译和出版工作继续给予支持。

中国农业博物馆曹幸穗研究员在发言中,详细讲解了二战结束前日本针对中国所作调查的概况,并以时间为线索,辅以地理因素,全方位梳理了满铁资料的形成沿革与分布情况。并扼要介绍了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满铁资料研究课题的提出、研究现状与相关成果。他对中国农村研究院克服各种困难、勇挑学术重担的胆识和实践极为赞赏,同时期待这套权威的中译本将对满铁资料服务于多学科研究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南开大学张思教授在发言中,分享了以历史学视角运用满铁资料进行相关课题研究的经验。他认为,国外学者在满铁资料的使用上已经走在了我们的前面,且已取得了不少学术成果。但是,这些基于中国的调查数据完成的相关论文是否准确,国内学术界无法与之对话。《满铁调查》系列丛书的编译出版将有效地填补中文版满铁资料的空白,并将极大地推动满铁资料这一学术富矿的价值挖掘和利用。

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满铁资料研究分会秘书长、北京交通大学图书馆副馆长郑兰研究馆员首先对《满铁调查》第一辑的顺利出版表示祝贺,并希望有机会与中国农村研究院开展合作,携手推进满铁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以期服务于学界研究。

郑兰介绍说,满铁资料研究分会,作为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的二级分会,始建于1996年,2007年,分会及其秘书处挂靠北京交通大学。近年来,为了促进满铁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分会牵头办了几件实事:第一,自筹经费,成立了分会的研究基金;第二,启动了若干满铁相关研究,例如“铁路影响下的大连近代城市建设研究”等;第三,实施了满铁资料的数字化工程,截止目前已完成1万3千册,计400万页的扫描量。

在满铁资料的整理、研究以及数字化的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不少棘手的问题,如知识产权、涉密安全、合理使用、标引格式和外文翻译等。这些问题,有的已经解决,有的亟待破解。

总而言之,分会的工作仍处起步阶段,想法和做法仍很幼稚。值得欣慰的是,看到了在我们的会员之外,还有如此多致力于满铁相关研究的同人。真诚地欢迎华中师范大学的专家学者们能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为我们的工作不吝赐教,为分会的《满铁研究》电子季刊拨冗赐稿。

《满铁研究》执行主编、北京交通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许勇在发言中指出,《满铁研究》虽为“三无”(刊号、经费、印本)刊物,但力争有所作为,近年不仅刊载了苏崇民等专家的论文,还编译报道了多篇国内外与满铁相关的人物、动态、机构、会议方面的文献,并在新浪网上开辟了“满铁砖家”博客和微博。

他强调,《中国馆藏满铁资料联合目录》如同一个指路牌,《满铁调查》中文版才是彰显“实证、实践、实验”精神的务实成果。

随后,与会专家围绕国内满铁研究现状及相关成果,展开了热烈的交流和探讨,并回答了多家媒体朋友提出的问题。

最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满铁调查》中文版的总负责徐勇教授作了总结发言,徐勇教授指出:之所以决定编译《满铁调查》,就是要打破“中国农村在中国,中国农村调查在日本,中国农村研究在美国”的学术生态格局,旨在洋为中用,服务于国内的农村研究。在编译团队的努力下,《满铁调查》第一辑终于面世,这是浩大学术工程的一次探路,希望学界继续给予关注,以期共同推动满铁资料的搜集整理,服务于学术研究。

所谓满铁是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简称,满铁始建于1906年,1945年解体,在中国盘踞了40年,满铁不仅是经营铁路的公司,还是为日本政府、军方提供相关政治、经济、社会等情报的特殊机构。所谓“满铁调查”是日本侵华期间对所占领的中国东北、华北和华东地区农村进行的专项调查,是综合反映这些地区经济社会全貌,了解和研究20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村社会的宝贵资料。近年来,学术界利用“满铁调查”资料进行了大量的学术研究,形成了一大批极具价值的研究成果。但国内对“满铁调查”的翻译出版工作进展缓慢,给学界的研究造成了极大不便。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大胆探索,多方筹款,借助于黑龙江档案馆、日本相关大学以及出版社等整理的满铁调查报告资料,组织了专门的编译团队,计划用5、6年的时间陆续将其译成中文,并整理出版。该译丛书系内容庞大、涉及面广,拟定出版100册,每册100万字,总计1亿余字。百册《满铁调查》的出版完成,不仅会填补满铁资料中文版的空白,还将引发新一轮的满铁研究热潮,并为解决近现代史上一些有争议的研究课题和现实问题提供文献依据。

参考文献: 搜狐读书、央广网、凤凰资讯、中国青年报相关报道

“滿鐵”與《滿洲日日新聞》的創刊

谷胜军*

摘要: “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是“日俄战争”为日本献上的厚礼。同时，“满铁”的成立也为《满洲日日新闻》的创刊提供了土壤，更为该报赖以生存的环境注入了活力，为其长期的发展、存续提供了坚实的保障。“满铁”的建立标志着日本对东北实施文化渗透、殖民统治、经济掠夺的开始，它加快了东北殖民化的进程。作为“满铁”的机关报，《满洲日日新闻》将日本对东北的殖民主义方针在舆论宣传上推向了极致。

关键词: 满铁；成立的动因；文化渗透；《满洲日日新闻》

“满铁”的建立将日本在东北实施殖民文化、经济统治的梦想变为现实，为日本在这个地区宣扬自己的价值观创造了物质条件，更为日本构筑区域性文化框架搭建了平台，也将日本推向了极致的军国主义。其中，在舆论导向、文化宣传等方面，为日本在中国东北实施殖民化政策、区域经营发挥特殊功效、做出巨大贡献的要数 1907 年 11 月 3 日在大连创刊的日文报纸《满洲日日新闻》。笔者以文献调查的方法，对《满洲日日新闻》原件以及重要官方文件进行深入挖掘，并对相关史料进行收集、整理和分析，同时，援用历史学、社会文化学的理论，以满铁的成立为切入点，对日俄两国争斗的伦理价值内涵、殖民文化观、满铁的组织原则、《满铁日日新闻》的创刊背景及目的、精神指向和生存依托进行探讨和研究。

一、日本的自我认识与满铁成立的契机

甲午战争之后，日俄两国都试图通过武力解决东北的争端。“日俄战争”与其说是日俄两国武力、国力的较量，毋宁说是双方文化、意识形态的争斗。中国和朝鲜都是沙俄在远东的重要战略目标，是其武力侵略、文化渗透的主要目标。为获得在东北的重大利益，沙俄承认了德国在胶州的军事占领，旨在为日后占领辽东半岛寻找借口。

1897 年 11 月 22 日，他们在没有事先通知中国、获得清政府允许的情况下，擅自将舰队开进旅顺港，继而海军登岸，强暴杀人之事经常发生。对此，俄国驻京代表巴布罗福（A. Pavlow）竟然厚颜无耻地照会中国政府说，俄国并无夺取中国领土的意图，他们占领旅大纯粹是为保护中国免受德国的侵略；一旦德国军队撤走，俄军也会随即撤退。沙皇在接见清朝驻俄国公使杨儒时更是信誓旦旦：“俄船借泊，防护他国占领”（1）俄国的战略意图是它在西方的利益不受损害的前提下，妄想把东方的霸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马克思曾指出：“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还活着，就仍然是社会的产物。”近代的日本勇敢地面对欧洲的近代文明，大胆地引进西方文明，较顺利地进行了有关国家前途、命运等方面的改革，举国推行“殖产兴业”路线，因而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实现了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由此看来，日本对东亚的认识及其价值观的改变都来自于“代价很大的心力上的整顿，只有在其民族显示出特种力量的趋向上得到良好结果。”（2）日本最大的收获就是自我意识的更新。这种更新不仅从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法规上得到了验证，而且

* 谷胜军，男，湖北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从国民的思想、观念上得到了体现。日本政府实施一系列法规、政策，这种自上而下的变革不但使日本在国际事务中得到认可，更是在国际上获得了巨大的利益。明治维新的另一个成功之处在于，使日本摆脱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日本真正获得了独立自主的权利，并且成功地操纵了国内的舆论，比较顺利地处理了国内的各种矛盾，这些都为日本迈向资本主义道路、实现日本式的近代化国家奠定了基础。

19 世纪 70 年代，日本作为新兴力量在东亚崛起。日本对台湾的侵略给予清朝以沉重的打击。但与此同时，日本也清楚地意识到：对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各国的渗透以及武力入侵都并非易事，要单凭日本自身的能力很难实现这一点。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下，日本要想彰显自我、实现“作为亚洲人种的盟主”的目标，是得不到西方强有力的支持和帮助是很难想象的。为了得到英国的支持，从 1901 年 6 月开始，日本开始了与英国结盟的活动，并且把它作为今后自己的重要对外方针。同年 7 月 31 日，林董（3）最终促成了日英同盟。“向英国海军学习，通过实战积累战术与战技经验，调查研究先进国家的兵器、装备，使我国的兵器制造、军舰制造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准，但在电器通信、光学、音响、航空等方面仍然落后。”（4）在日本人看来，欧洲的英国比美国更具有可靠性，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在意识形态方面，日本的价值观似乎与英国更加贴近。更何况在对待东亚以及俄国的问题上，英国一直以来都站在日本一边，支持日本。日本的一系列举动博得了英国的好感，使英国更加确信日本是他们在东亚真正的朋友。对于日本来说，日英同盟的缔结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使日本及时调整了对俄战争的方针。正如兰斯敦所言，“英日同盟虽然不是旨在策动日本政府走向极端，但它所起的而且必然会引起后果，是使日本感到它可以与它在远东的劲敌进行较量，并夺取它的胜利果实。”（4）

从这个意义上讲，英国在给予日本以军事援助之外，更从心理上帮助日本摆正心态，在东亚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日俄战争是作为东方的黄种人针对白种人发起的第一次挑战，日本人在这次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从而提高了其国际地位，为日后称霸东亚打下了牢固的基础。许多资料显示，日本在战争中，完全摒弃了过去那种不自信和惶恐的心态。

日俄战争的胜利，为日本在东亚开展“殖民政策”、落实“殖民方针”打下了比较牢固的基础。

二、“满铁”的成立与日本人的价值观

对于满洲各个铁路的未来走向问题，即满洲铁路的归属问题，日本并没有因为日俄战争得到答案。英美对日本的声援与援助是有代价的，这也是近代西方制约东方的手段之一。美国从中调解，使战争尽快得以结束，从而使日本获得了巨大的利益。美国提出与日本共同经营满洲铁路的要求符合美国一贯倡导的外交路线，各国列强都想从满洲铁路中获利。

在日本看来，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而对满洲而言，日本的生命线就是满铁。日俄两国政府经过交涉，在 1909 年 1 月 21 日，发表了拒绝回答美国提议的声明。在日本看来，“满铁”是用十万将士的生命和二十亿货币苦战两年换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可以向俄国让步，但不会认可美国提出的议案。日本人清楚地意识到，美国在大洋的彼岸，势力范围要想伸到东北绝不是易事，而俄国就在附近，其领土与东北相连，可以随时干涉中国，甚至可以用武力入侵东北，这就会给日本造成麻烦。众所周知，“满铁”是日本依据日俄两国缔结的朴茨茅斯条约

而订立的。在东亚建立一个类似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其规模、经营理念乃至经营方式完全以英国的经验为准，其建构“东亚印度公司”的理论思想是日本创建满铁的基本出发点。确切地说，日本在日俄战争之前就已经形成了对开发和利用东亚的理论框架。

笔者从 2011 年 6 月开始，作为研究人员曾在日本逗留了几个月，见到了满铁会（该会的会员多为满铁时期会社职员以及满铁二世）的常务理事天野博之先生，并进行了长达四个小时的谈话。天野曾言：“日本开发东北，投资兴建了东北的现代工业，建立了学校。因此，日本对满铁寄予了厚望。”按照天野的说法，日本在对东北的建设上花费了巨大精力，在投资方面甚至超过了对日本本土的规模，日本确实要把东北当成了实现所谓日本式的东洋现代化的试验场。从这个意义上讲，满铁是日本近代资本主义资本积累的代表，是日本从近代化迈入现代化必经的一个阶段性的组织机构和表现形式，这为日后日本发动一系列事变、战争积累了资金，奠定了基础。古市公威（5）认为日本对满洲经营的方案应该是“满铁经营不只是单纯的铁路问题，日俄战争的结果使日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流了大量的鲜血而获得的权利。对此，应该树立百年大计，应该把它视作是日本永久的事业。”

谈到满铁，就必然要论及后藤新平。以经营铁路为中心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在经营铁路的同时，后藤计划在十年内从日本国内移民十万人到满洲，以防范俄国再次蓄意发动战争。为此，他提倡“旅顺解放论”，要将旅顺从要塞的街区变成学都、商都城市，而且要在中心设立旅顺工学堂（后来的旅顺工大）。如果“在满洲拥有五十万的移民，数百万的牲畜。战机一旦对我们有利，就可以做好向敌人进攻的准备”。这样做的目的有两个：第一是要营造阻止沙皇南下的政治文化氛围。第二是考虑到与美国的关系。后藤对大连的设想是建立一个新大陆，即所谓的“新旧大陆对峙论”。亚洲大陆将来必定会与美洲大陆隔海相望，形成对峙的局面。到那时，亚洲大陆的中心是中国。尽管后藤的设想远大，但是他仍然没有脱离那种东方国家传统的意识形态，以“人多必胜”为基本理念。后藤对“满铁”的经营采取了“英国与东印度公司关系”式的经营理念。后藤殖民政策的中心，用今天的话语解释就是“就地主义”。这种方式适用于对台湾的经营并取得了成功。但是，他更想把这种模式带到满洲，从而不受本国官僚政治带来的“制度规则明细”的制约，从而具有自由的“能动性”（日语是ダイナミックス）。后藤新平喜欢使用的词汇是“比目鱼的眼睛”一词，即两只眼睛可以同时关注两个方面的事物。1914 年，他在“幸俱乐部”的演讲中指出，“殖民政策之意就是文装的武备，打着王道之旗行霸王之术。这种事情在当今殖民政策实施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后藤在实施王道霸术的同时，试图从经济到学术、教育、卫生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统治。为了同化殖民地人民，后藤强调的另一个事情就是教育，他采取了一种“缓冲式”的教育方式。在后藤看来，教育和“旧惯调查”一样重要，不可操之过急，“教育的快速进步”必定会遭来民众的反抗。为此，网罗人才势在必行。天海谦三郎（东亚同文书院出身，对中国进行旧惯调查的专家）提出，“调查时不是把自身作为调查的对象，而是通过调查，通过与中国人的接触，了解他们的身体”。“小学教育是满铁施政建设的第一步，其取得的成绩直接与满洲殖民地的命运息息相关。”为此，他首先在盖平开设了工学堂，其目的是促进和提高附属地附近中国人子弟的文化水平，同时推广和普及日语，以便日满提携、共同开发满洲。在后藤看来，对殖民地学龄儿童进行教育即等同于对土著人进行教育。因而他在各地都加设了高等科以及寄

宿学校。当然，日语是这些学校必须要开设的科目。1912 年，开设了奉天外国语学校、安东中日恳谈学校、吉林中日语学校。在抚顺、本溪湖地方开设了本科学校，招收了 190 名学生。

后藤认为解决宗教问题是殖民统治的关键所在。对此，他进一步解释说，“必须让殖民地的人民归附帝国。像佛主所言，皈依之事是第一要务。……殖民统治更需要这样。只有经常利用人的弱点，抓住人的本性的弱点来实施统治，方能保证百年大业。”宗教和殖民地政策就是要以“攻心”（日语是心をとらえる）为目的。

“满铁”的建立使东北的生产关系发生了变化，而将从前中俄间的关系转变为中日间的关系。这种新的变换势必要产生新的民族关系与阶级关系。“这种互相斗争的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战争和暴力掠夺在这些新阶级的产生过程中起到了巨大作用。中华民族与日本民族的矛盾由此升级。从“满铁”建立之日起，日本对中国的掠夺便进入到一个有组织、有计划、有节奏、有规模的阶段。这种民族的矛盾会随着本民族对其他民族的了解、认知而逐步升级、恶化，从而最终演变成新一轮的战争。

三、《满洲日日新闻》的创刊

为了将自己所代表的所谓先进文化融入到殖民地，澄清污浊的殖民地文化，从而以武力或者同化的手段兼并、吞没殖民地，日本当局进行了长年累月、坚持不懈的努力，并从敌对国或者其他国家手中不断获得能激发自己国家综合国力的力量，以使这种综合国力持久增长。

从文化的视角探讨满铁与《满洲日日新闻》的话，“硬的经济和军事权利的增长会提高其自信心、自负感。”日俄均想通过军事实力来加强领地建设。因为他们都清楚地认识到，“软权利只有建立在硬权利的基础上曾能成为权利。”在当时的俄国人看来，俄国自身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对东亚民族极具吸引力。在中国的东北，特别是哈尔滨，已经有了栽培俄罗斯文化的土壤。而且俄国的势力也已经在朝鲜渗透，下一步等待开发的领地就是日本。而在日本看来，俄罗斯的文化极具侵略性。如果不从武力上战胜俄国的话，日本也很难自保。日本民族以及文化能否延续、生存下去就在此一搏。他们清醒地看到，文化“被看作是根植于物质上的胜利与影响时，它们就有吸引力。”日本自身的成功使他们相信至少在东亚圈内，自己的文化或软权利与其他民族相比更加优越。因而，他们试图增大、增强本民族文化和意识形态对其他民族的吸引力。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叶的世界，正是充满武力战争的世界，这个时期也是确认“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吸引力，其他国家更愿追随”其领导的时期。日俄战争正是日俄两个列强并通过彰显各自的硬权利并争夺在东亚的软权力而发动的战争。日本并没有因获得战争的胜利而感到万事大吉，也没有因为获得南满洲铁路的所有权而感到高兴。日本能否平息西方的舆论，自己所谓的新东洋思想、意识观念能否得到西方的认可，特别是英美国家的认可，就直接决定了日本能否在东北能站住脚，并继续生存下去。

日俄战争之前，日本对华的舆论操纵及文化宣传就已经开始转型。这种转型表明日本对华有了一个新的认知，同时也表明日本清楚地意识到世界格局不允许日本在中国南部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从“北守南进”到“北进南守”政策的转变说明，从 1901 年开始，日本的对华策略发生了巨大改变。从 1898 年开始，日本就已经进入对俄战争的准备阶段。舆论的转型势必操纵文化的转型，日本人

对文化的认知发生了质的变化，整个民族确信要发展经济、提高国民生产总值、改变国家的命运，就必须按照山县内阁的既定方针一致对外。这样，整个日本民族就成了一部战争机器，积极为日俄战争做准备。同时，日本强调面对西方列强对远东的侵略，同文、同种、同教的日中联盟能形成以“东洋”思想为核心的东亚民族主义。

准备与俄国的战争，并竭尽全力推进富国强兵的国策、转变国内的经济危机，使日本萌生了再创辉煌的念头，更使军部抓到了对外扩张的机会。转变政策也使外务省对新闻操纵、文化宣传变得更加具体化，“对报纸的掌控从原来的中性立场逐渐转向宣传战争、宣传日本的国威、宣传日本的生命线的重要性”上来。在这一方面，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废除了天津的《国闻报》(6)。1902年4月3日，日本驻清公使西德二朗在给外务省的报告中明确提到：“《国闻报》的论说和记事常常表达与改革派同样的意思，从而伤害了清廷的感情，因而毫无益处可言……外务省对日本在华经营报纸的方针是：《国闻报》应单纯是一种我国外交的机关报纸。而在宣传帝国政府、报道清廷时，要特别慎重，不能背离善邻友谊的本意。”日本政府同时也利用中国变法、改革派的行为大造舆论，宣称要帮助中国变法，以维护东亚和平，借此转移国内民众的视线，将矛头一致对外。为此，日本加大了对国内舆论的控制及对华的宣传力度。观察整个日俄战争就会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这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与沙俄这个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对抗，是对现实生活、现存状态的一种无奈的背叛。此后，日本又把希望寄托在上海创办的《同文沪报》上。外务省自1902年12月开始，每月都向《同文沪报》支付527日元的补助金，以帮助井手三郎顺利经营该报社，此外，上海总领事还提供了不少资金。随着日俄战争的爆发，外务省加大了其补助金的投入。他们在原有的补助金的基础上，还增加了300日元的宣传扩展费。这样，《同文沪报》一年就能从外务省得到大约一万日元的资金补助。外务省要求该报加大宣传力度，以期该报纸能派上更大的用场。在日俄战争期间，尽管外务省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了相当数量的资金，以弥补欠缺的经费问题。但是，《同文沪报》却是一种没有按照这种模式运营的报纸，它并没有因为战争的扩大而增加发行量，对战争的报道做的也不到位，也就是说，没有完全按照外务省的精神发表评论，从而违背了外务省要求的“属于日俄战争时期的报纸有关贵地的新闻操纵问题，不仅要在战争中为该报打下一个牢固基础，即使在战争结束后，该报也要有相当的地盘”的规定。为此，外务省直接向上海总领事发布训令：“原本本省创设该报的目的在于，因为一旦战争爆发，在贵地驻扎的俄国将官以及其他人都都会站在俄国人的立场上捏造事实，肆意在中国国内散布虚假报道。而愚蠢的中国人会把此等报道错当成事实的真相。这些都会事关日本的利害，所以，每日要把相当数量的《同文沪报》免费发送给总督、巡抚以及其他地方官。”永泷总领事对《同文沪报》也没有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但永泷同时进言到：如果这么一味地对该报进行资金补助，还不如将资金投给那些有影响力的报纸，这样对外务省操纵报纸有利。从这点可以看出，作为日本在沪总领事的永泷，他对日本在沪的新闻报纸等媒体机构了如指掌，他在给外务省的报告中，透露对《同文沪报》的失望。他作为外务省在沪的发言人，代表外务省宣判了《同文沪报》的死刑。1907年8月10日，外务省电告井手，表明仅仅再给一年的补助金，接到这个通知的井手不得不在第二年的1908年2月将该报转卖出去。这样，《同文沪报》终于结束了8年的经营历史。

战争总能提高报社的数量和报纸的发行量，所以，战争和报纸是一对孪生兄

弟。《满洲日日新闻》高唱日本在战争中所代表的正义立场，成为日本夺取辽东半岛的一个“合情合理”的舆论支撑，并借助报纸将西方列强，特别是俄国的媒体势力挤出东北，从而达到在舆论上独占东北的目的。作为“满铁”的机关报，社长森山守次（7）在当日的创刊词中，开宗明义地对《满洲日日新闻》的创刊方针、意义、目的进行了详细论述。“逢天长节佳辰之际，仅此《满洲日日新闻》创刊，我等自知菲才、力薄才浅，然力图将笔墨触及全满洲之各领域。虽恐招责、实感平息各方议论、发表己见之难，但我等竭力进取，期待充当我满洲经营之急先锋是也，然则因我等皆具忠诚爱国、忧虑众生之资质也。”

如上所述，文化的衰退导致国家、民族的衰退。当时的东北形势是日、清、俄三国平分秋色。即俄据北、清据中、日据南。从这个角度看，东北似乎成了日俄的角斗场。对该地的政务，清政府好像没有了发言权，被完全排挤于外。对日俄两国在满洲的所有权一事，世界舆论更倾向于日本。正是借助这种“鸿运”，《满洲日日新闻》得到了创刊。日本试图通过该报刊向世界解释、说明日本的立场、观点，从而加大、加强在东北的舆论主导权，力争在世界舆论阵地上占有一席之地。如果说，北京的《顺天时报》和上海的《同文沪报》纯粹是为了赢得日俄战争胜利而创刊及经营的话，那么，“满铁”和《满洲日日新闻》就是这场战争的战利品。《满洲日日新闻》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下出现的一份特殊报纸，是日本在东北土地上创办的一份旨在宣传日本对东北政策的机关报，是半殖民地的东北在无力掌控自我文化和舆论主权的情况下所出现的特殊产物。以大连为中心，采用辐射式模式是当时日本在东北地区办报的特点。《满洲日日新闻》代表了“满铁”，尤其是代表了日本官方的立场，它将满洲各地的报纸囊括在其中，是全满洲最大的日文报纸，是日本在东北实施殖民主义政策的“急先锋”，该报的宣传为日本统治东北奠定了牢固的理论基础。

注释：

（1）关于俄国强占旅大，并且强迫清政府签订《旅大租地条约》、《旅大租地续约》、《中俄勘分派大租界专条》，请参阅《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三卷“一八七一年同治订约至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王云生编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07月，第187-205页。

（2）《日本百年外交史》，米庆余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8月，第47页。

（3）林董，1850年生于日本千叶县佐仓町，1862年移居横滨，开始接受英国教育。1866年留学英国，后任驻英公使以及外务大臣，竭力主张日英同盟。

（4）《兰斯敦勋爵》，牛顿，伦敦.1929年版，第308页。

（5）古市公威，曾任朝鲜统监府铁路管理局局长，极力推荐后藤新平出任满铁总裁。

（6）发行地天津，1897年10月26日创刊，创刊人为王修植，之后转给日本外务省，由西村博经营。

（7）《满洲日日新闻》报社初任社长，1875年生于日本佐贺县，东京帝国大学法科毕业，后留学欧洲，归国后任台湾总督府官员，与内田良平交往深厚。在内田极力推进日韩合并运动时，以在京同志的身份竭尽全力给予援助。组建了《朝鲜问题同志会》，执掌中央舆论部门的工作。之后来到中国，在天津、北京等地进行写作，后转至满洲，《满洲日日新闻》社长卸任后，于1917年左右成立了“三国公司”，试图从事开发满蒙资源以及生产的贸易工作。此后，又在大连创刊了《远东周报》。晚年回到日本，任内田良平的养正私塾讲师。1929年患胃癌病逝，终年五十五岁。

“滿洲醫科大學”在中國東北侵略罪行研究

王玉芹*

内容提要: 医疗卫生作为殖民统治重要手段和策略, 备受日本殖民当局重视。日本殖民者于 1911 年在奉天设立了南满医学堂, 1922 年升格为“满洲医科大学”。该校是为日本殖民侵略和殖民统治政策服务的。不仅采取活体解剖、赴死刑场解剖、去墓地收集、接受奉天监狱死尸等残忍手段收集人体标本, 而且竭尽全力支持 731 细菌部队, 大量盗藏中国医学典籍, 为日本殖民统治培养活跃医师, 根据时局变化确立研究课题, 长期对内蒙古地域进行宣抚医疗。

关键词: “满洲医科大学”; 东北; 侵略

日俄战后, 日本殖民者开始踏进中国东北。作为文化侵略手段之一, 满铁在东北设立了诸多医疗卫生设施。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满洲医科大学”, 殖民者欲将该校打造成殖民医疗政策的根据地。然而由于诸多原因国内学者对此问题研究甚少, 只有孙玉玲著《“满洲医科大学”与日军细菌战》和伊力娜著《满洲医科大学内蒙古地域巡回诊疗》, 这两篇文章分别从不同侧面论述了“满洲医科大学”在东北的侵略罪行。日本学者对此问题研究较多。日本于 1978 年出版了《满洲医科大学史》一书, 该书在客观介绍该校发展历程的同时, 对其侵略罪行有所涉猎。末永慧子著《戦時医学の実態 - 旧满洲医科大学の研究》(樹花舎 2005 年), 文章较客观地概述了“满洲医科大学”的研究意义、医学研究的特征及人体标本的收集方法等。本多胜一著、鹤钟祥译《活体解剖的魔窟—满洲医科大学旧地寻踪》, 该文是利用采访、口述形式写成的, 第一手资料欠缺。真柳诚著《满洲医科大学旧藏古医籍の行方》, 文章对“满洲医科大学”盗藏中国医学典籍情况有所涉猎。本文拟对“满洲医科大学”在东北侵略活动作一全面阐述, 以期深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

一、“满洲医科大学”的设立及其实质

明治维新后, 日本迅速增强军备, 向台湾、朝鲜、中国等邻国扩大势力, 进行对外侵略。日本新殖民政政策的先驱后藤新平是医学出身, 特别强调卫生事业在殖民统治中的作用, 将其视为殖民统治重要手段和策略。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后, 作为“台湾卫生局局长”的后藤新平将日本国内的医疗卫生制度全盘移入了台湾。其后, 又将殖民医疗卫生事业的魔爪伸向了东北。日本殖民当局如此重视医疗卫生, 其原因有四: 一是受日本国内卫生事业影响; 二是在日本殖民地支配政策中, 有强调“国家卫生”的倾向; 三是作为对抗欧美各国挑战的方针; 四是“满洲”居民过去饱受传染病、地方病之痛, 传染病蔓延对该地是极大威胁。^{[1] (83)}

1906 年满铁设立之初, 即在地方部设置了卫生课。1907 年夏, 大连、辽阳、安东霍乱流行, 1910 年鼠疫大流行, 东北的患者达 5 万之多。^{[2] (831)} 为控制疫情蔓延, 更好地进行殖民地经营, 日本政府投入巨资进行了疫情的防治, 同时决定在东北设立专门用于开展教学与调查、研究的专门机构。然而就学堂选址问题, 满铁高层们意见分歧。有的主张在医院规模较大、设施较好、医务人员较多的大连办学, 有的主张在辽宁省省会奉天办学, 最终从日本侵略的长远利益考虑, 设在了东北的中心——奉天。1911 年 8 月 24 日, 日本以敕令第 230 号《关于南满

* 王玉芹, 女, 吉林省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

医学堂须遵循专门学校令之件》公布正式设置。当时由满铁地方部卫生课管理，1918 年改由地方部管理。医学堂设堂长、教授、助教授、助手、技术员、舍监、学监、干事、事务员等职。历任名誉总裁为：赵尔巽、张锡銮、段芝贵、张作霖。这是我国东北最早、最大、设施最齐全的高等医学校。南满医学堂招生对象为初中毕业生，医学科学制 4 年，药学科学制 3 年，研究科学制 1 年，预科学制 2 年。第一届招收了 28 名学生，其中日籍学生 20 名，中国籍学生 8 名。

1918 年 12 月，日本颁布了《大学令》，日本的医学专门学校都升格为大学。为保证在留日本人从小学到大学完整的教育体系，同时加强与欧美列强在东北创办的高等教育进行竞争，南满医学堂也迫切升格为大学。1922 年 5 月，满铁社长早川千吉郎向关东厅提出升格申请，得到批准。这样，南满医学堂升格为“满洲医科大学”。设有卫生学、微生物学、病理学和营养学等学科，并将“开拓卫生”作为研究重点，以确保日本移民定居“满洲”。该校当时校长是松井太郎，有教授 20 名，助教 16 名，讲师 11 名，干事 1 名，书记 19 名，助手及技工员 46 名。^{[31] (15)}该校学制 7 年，1926 年增设 4 年制医学专门部，专招中国学生，并允许中国女生入学。1937 年日本撤销“治外法权”，满铁附属地行政权转让给伪满洲国，但该校仍归满铁管理。从 1942 年开始，由于微生物学教授北野政次带领一批人去了 731 部队，同时战争将更多的日本青年带往战场，学校中教学力量不足，便逐渐开始吸收中国学生留校。1945 年，由八路军接收管理。1946 年 4 月，更名为沈阳医学院。

设立“满洲医科大学”的目的和指导原则完全来自满铁首任总裁后藤新平殖民政策的核心思想——“文装武备论”，即“以文事设施以备他人之侵略，一旦有缓急之事俾便帮助武断之行动”。^{[4] (9)}“文装武备论”是和“举王道之旗行霸道之术”紧密相联的，关于后者，后藤新平称之为高等殖民政策。他认为，“帝国的殖民政策就是霸道”，必须是以强硬的手段来加以推行和实施，但同时又应不失时宜地推行“王道”。所谓“王道”，就是要通过“发展经济、学术、教育、卫生等”，以此使殖民地之人心“归依帝国”，达到“建设一个广义的文明社会”，^{[5] (52)}如若不然，只靠武力而不知致力于文化统治，一旦发生战争，则得不到民众的支持，无潜在的军备，必然要立即崩溃。后藤提出在东北创设南满医学堂时说，“在协助台湾统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样在东北也会产生非常效果”，“是文装意义上的好武器，一旦发动战争时，对殖民地政策非常必要，对永久占领该土地奠定基础”。^{[6] (10)}可见，与赤裸裸的武力侵略相比，“文装的武备”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为殖民统治披上了合理合法的外衣。《满铁十年史》陈述了南满医学堂的成立目的，“在‘南满洲’普及医道是满铁的文明使命，也是安抚中国人的要诀，所以应尽早成立医学校”。^{[7] (866)}由此可见，“满洲医科大学”的设立是为日本殖民侵略和殖民统治政策服务的，其最终根本目的是要从精神上消除中国民众对日本的对立情绪，达到麻痹中国民众和奴化教育的目的。正如后藤新平所讲，“殖民地医疗卫生事业不仅成为殖民者改良风土的工具，也是摧折被殖民者传统与自信心的重要手段。”^{[8] (4)}满铁在东北兴建学校医院等，使其文化侵略东北的功能日趋完善。满铁通过这些医疗卫生设施和科研教育机构，进一步掩盖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进行殖民侵略的实质，同时也加强了其文化侵略的力度。满铁的卫生医疗设施、科研教育机构与其控制的其他文化手段一起，在东北地区共同构筑了日本文化侵略的堡垒。

二、“满洲医科大学”收集人体标本黑幕

为出色地完成“培养大陆活跃的医师”使命，“满洲医科大学”致力于人体

标本的收集，然而其收集手段令人发指。

第一，活体解剖。“满洲医科大学”极有可能进行活体解剖。从证人证言看，该校解剖学教室实验勤杂工张丕卿证言，“我叫张丕卿，现任沈阳中国医科大学技师。1932年在满洲医大任实验手，直至1945年祖国光复。最先为日本人打扫卫生，运送日本人上课时使用的标本，实验结束后进行收拾。那以后直到祖国光复，除打扫卫生外，还从事固定死尸（向尸体里注射某种药品，防止尸体腐烂）和制作骨骼标本工作。这期间从1942年秋到1943年春，日本人先后进行五次活体解剖。”^{[9] (19-22)}“满洲医科大学”毕业生有如下证言。“学生时代，从离家很近的皮革制造者那听到满洲医大活体解剖事情。据说皮革制造者从交往很深的解剖学教室男孩（名字不明）那里知晓了活体解剖情况（男孩将解剖学教室所藏药品私卖给皮革制造者）。而且，关于活体解剖一事，中国学生间谣言四起，从朋友那也间接听说过。”^{[6] (29)}其次实物证明。日本福岛县立医科大学教授末永惠子在其《战时医学实态》一文中列举了11篇表明解剖学教室关系者可能进行活体解剖的论文题目。^{[6] (30)}值得一提的是大野宪司《支那人大脑皮质尤其后颈部细胞构成学研究》一文使用了“没有精神疾病既往史健全的新鲜的北支那人成人脑”。^{[10] (19)}竹中义一论文《北支那人大脑皮质尤其侧头叶的细胞构成学研究》写着“我屡次使用极其新鲜且健康，尤其没有精神病学病例的北支那人脑”，^{[11] (21)}毫不夸张地写着把材料弄到手的事情。五十岚《北支那人大脑皮质——尤其带转的皮质构成》中有这样表述，“使用材料是死后不到几小时，最新鲜的健康的北支那人男性脑”。^{[12] (22)}

第二，赴死刑场解剖。“满洲医科大学”的标本收集并不局限于学校内部，经该校疏通各方面关系后，还可到死刑场解剖。病理学教授久保久雄就曾到死刑场解剖过“匪贼”。“我听说1933年11月中旬，对在农安北部农田讨伐时逮捕的27名匪贼处以死刑。如何搞到教室的病理解剖材料，使其不断增加，并将其与今年夏天热河地方性甲状腺肿流行地解剖的材料进行比较，此外在研究上也是难得的资料，所以立即向有关当局提出对死刑者进行病理解剖，满洲国方面和当事者都充分了解我的意图，同意解剖。（中略，十二月二十八日）将农安西门外两支里荒漠的原野中的某块墓地作为临时刑场，执行死刑。可是，因为我们有急事，所以到达刑场稍稍晚了一步。黑山般群众，我们一边听到连续枪响，一般推开群众，然而赶到时，13人已经不在人世。（中略）允许我们对除头目外的12人进行病理解剖。（中略）（将遗体运到邻近寺庙院里）焚烧事先准备好的高粱秆，并在上边添加煤，将火烧旺，之后我和吉田敬助君分工解剖。（中略）这种场所的解剖尽量早些完成。所以我们简直是在拼命。因为严寒，解剖完两俱尸体时，感觉手指已经不能充分活动，无法做细微工作。于是，暖暖手提起精神，一气呵成解剖完12俱尸体。中午开始，午后两点左右结束，正好用了两小时。（中略）那天在宿舍，为包装提取的材料，忙到很晚。第二天早晨也就是二十九日早十点告别了记忆尤深的农安，驱车急驰在冻土上，赶赴新京。途中荒漠的原野，环视四周白雪皑皑，气温骤降到零下30度，这是北满真正的严寒，连在汽车中都感到寒气刺骨。可是，达到了目的，着急回去的我们的心理和意图还是明朗的。（中略）最后向在这次工作中给予我们莫大援助和关照的吉林警备骑兵第一旅长刘玉混少将、吉林省骑兵第一旅团军事指导官骑兵大尉山崎保光和骑兵少尉石桥考一及农安日本领事馆分室的各位致以忠心感谢”。^{[13] (35-36)}

第三，去墓地收集人体标本。据南满医学堂第一届学生崛江宪治回忆，“在用于1904、1905年鼠疫大流行搭建的临时板房里，武田先生教授解剖学，因为

没有骨学教材，四名日本学生和一名中国学生分成组，夜里冒着零下五六十度的严寒和危险，挖掘北陵墓穴，中国人学生和日本人学生都用功学习，竭尽忠诚。”^{[14] (654)} 另外，很多当地人坟墓经长时间风吹日晒，偶尔可以看到部分人骨露出，一些学生就挖掘这些人骨，之后进行加工，做成漂亮标本。满铁职员经常冒着零下四五十度的严寒，将穷乡僻壤冻死的尸体运到死尸室，作为解剖材料。然而，不光医学院校容易弄到人骨，日本的殖民学校都存放很多。据少年时代就来到东北的野村章回忆，“在奉天第一中学读三年级时，开设了生理卫生课。最先是骨格系开始学习的，可是第一次就被集中在阶梯教室学习，刚一开门就大吃一惊，每个座位上都摆放着一个头盖骨和脊椎骨，其实物就是人骨。由于日本侵略满洲，中国人民土地被抢夺，丢弃了祖坟，饿死的农民也很多。到荒郊野外收集人骨不是难事。该校每个班级人骨都放进很大的木箱里。”^{[15] (25-26)}

第四，接受奉天监狱死尸。为筹集更多解剖材料，该校加强与奉天监狱联系，经常从奉天监狱接受死尸。中井久二从 1943 年 5 月到 1945 年 8 月 15 日一直担任司法矫正总局局长，任局长两年多时间内，将“数百名收容者尸体”寄送了“满洲医科大学”。以下是中井久二证言，“1943 年 5 月到 1945 年 8 月 15 日，我在司法部参事官及司法矫正总局工作，奉天第一监狱应伪满洲奉天医科大学要求，在监狱内病死、无人收尸的几百名犯人提供给该大学作为解剖学的研究材料，在此名义下，押送到该大学，实施解剖。该监狱的行为，对中国人民来说，是违反人道的罪行。我作为监狱指导监督者，我负有责任，我认罪。”末尾写着，“1954 年 8 月 14 日于抚顺”。^{[6] (33)} 此外，每个死刑犯解剖前都下病理解剖通知书，从中国医科大学档案馆所藏郝振山和戴春臣解剖通知书照片看，上面写着“从奉天监狱寄送”。清晰的文字如实记录了“满洲医科大学”与奉天监狱的不法勾当。从 1936 年 7 月 27 日到 9 月 10 日，在约一个半月时间内有 25 俱下发了病理通知书，照此推算，一年解剖尸体至少达 300 俱。然而，这些死刑犯究竟犯了什么罪？他们真的是无人认领吗？死刑犯之一佟报功的妻子吴素珍在战后做了如下证言。“佟报功是农民，当时是车夫。1935 年某一天，便衣特务逮捕了佟，关进小南门监狱。逮捕原因一直不明。我探望丈夫两次。最初一次丈夫因被拷问殴打，全身是伤。1936 年第二次探望，丈夫大腿骨骨折了。而且那以后，听说丈夫被杀害了。我去监狱收拾尸体，监狱竟称，不知此事，最后事情不了了之，尸体没给我。”^{[16] (82)}

值得一提的是，“满洲医科大学”通过残忍手段收集到的人体标本除用于本校教学外，还大量运往日本，战后日本仍继续沿用这些标本。“满洲医科大学”解剖学教室教授，战后历任横滨医大、广岛大学医学部教授的铃木直吉战后利用该校组织标本出版了《器官组织额实习提要》一书，该书 1952 年由日本丸善出版社出版。另外，西成甫、藤田恒太郎、胜又正共著的《人体显微解剖图说》一书（南江堂、1955 年），与消化器官有关的附图，全部使用“满洲医科大学”收集的标本。^{[17] (24)}

三、“满洲医科大学”为日本殖民侵略和殖民统治服务的特性

“满洲医科大学”是日本为完成国策使命在殖民地设立的殖民医科大学，这就决定了其自始至终都为日本殖民侵略和殖民统治服务的特性。

1、对 731 细菌部队的支持。“满洲医科大学”为 731 部队培养了大批为其“开发满蒙”和侵略战争服务的医务人员。据《政府公报》和《医学杂志》记载，731 部队本部较有名望的专家、学者，有相当多的人，都毕业于伪满洲医科大学。如从事肠道传染病研究的仓内嘉久雄，就毕业于伪满洲医科大学，1937 年就职大

连卫生研究所；731 部队著名专家中黑秀外一也是伪满洲医科大学毕业的。^{[18] (121)}
 731 部队第二代部队长北野政次、731 部队支队——大连卫生研究所所长安东洪次等曾先后担任过“满洲医科大学”教授。任教期间，“满洲医科大学”成为他们进行细菌试验和活体解剖的魔窟，该校地下室有北野用来进行细菌实验的动物饲养室。北野在该大学的研究如果成功，100 细菌部队附属单位“满洲卫生技术厂”将根据其研究成果生产细菌。北野政次很多学生都与 731 部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 1942 年北野政次任 731 部队长后，“满洲医科大学”和军队来往频繁，曾多次接受关东军的委托研究，该校病理系研究生冈部一敏和满铁卫生研究所研究生冈田良夫在 731 部队长北野政次指导下完成《关于发疹的研究》一文，实验就在 731 本部。生理学专家、从事耐寒研究的 731 部队员正路伦之助坦言，“满洲医科大学的生理学教室也协助我们做了很多这方面研究。”^{[14] (33)} 731 部队著名的吉村耐寒研究，该校给予很多协助。此外，731 部队没有脑外科，据说与脑有关的试验“都运到满洲医科大学进行”。^{[6] (57)}

2、盗藏中国医学典籍。为进行中国书志学的研究，“满洲医科大学”特设东亚医学研究所，专门盗藏满铁抢夺的中国医学典籍。1929 年，满铁副总裁松冈洋右投入二十万日元，命令大连满铁图书馆从北京各书店强购了 3 万册古书。其中古代医书 1 414 种，约 6 000 册，赠送给“满洲医科大学”。书目分为“中国医学书目（1931）”和“续中国医学书目（1941）”。该校盗藏的典籍主要包括“元印《圣济总录》残卷、《解体新书》完本，明·赵开美版《仲景全书》等等，还有诸家、史书、类书、目录等”。^{[19] (152)} 目前，存放在沈阳市中国医科大学（前身是“满洲医科大学”）和呼和浩特市内蒙古图书馆的古典籍，很多都印有满铁、满洲医大旧藏印。为研究这些书籍，讲师冈西为人翻译了《宋以前医籍考》15 册，第 1~4 册是沈阳医学院出版，第 5 册以后是冈西氏油笔校本。此外，该所还出版发行了《日本和汉药文献》、《本藏经集注》、《中国医书本草考》等书籍。^{[14] (140)} 总之，该校盗藏中国医学典籍的目的，正如关东厅所言，“投入巨资经营图书馆或学校，是对东三省文化侵略的一个方法，同时提高了日本人进行各种侵略所需要的能力”。^[20] 由于满铁的抢夺和该校的盗藏，使中国很多珍贵的典籍甚至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典籍都落入了日本强盗之手，最终造成中国大量典籍的丢失和流散。

3、为日本殖民统治培养医师。医师是侵略者进行殖民医疗的重要保证，日本侵略者历来重视对医师的“培养”和“管理”。“满洲医科大学”从创设到闭学共计 34 年时间里，共培养中日医师 2 680 多名，药剂师 300 多名。其中中国医师 1 000 名，药剂师 70 多名。^{[21] (164~165)} 可见日籍医师远远超过中国医师。日本学者饭岛涉曾评价：“与其说满洲医科大学是殖民地大学，不如将其看作是设在满洲的日本医科大学。”^{[22] (128)} 该校毕业生分配是根据日本军方需要，毕业生散步在东北各地以及南方。为了保证医疗人员可以派到殖民者所需的重要部门或偏远地方，该校实行了有条件奖学金制度，只要毕业后在规定时间内、在指定场所进行工作，即给予丰厚的奖学金。分配到东北的毕业生大多就职于满铁。满铁在“满洲”经营的医院有 16 所，^{[2] (514)} 毕业生大多在这些医院工作。以 1928 年至 1935 年间 575 名毕业生为例，其中 430 人就职于满铁各医务部门，占毕业生总数的 75%。^{[23] (19)} 也有的学生成为满铁青少年义勇队开拓团常驻医生，^{[21] (160)} 还有的学生被派遣到伪满洲国军医学校。七七事变后，由于强化对医师的统制，开业行医很难，所以自有开业者大大减少。这反映出殖民地医疗向战时殖民地医疗转变。据“满洲医科大学”《会员名簿》相关记录显示，1939 年以后，标注“应

召中”、“出征中”、“入营中”人数明显增多。“满洲医科大学”毕业生曾回忆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年轻的教员逐渐减少。1943 年以后，高年级的日本人学生也逐渐被招募进入军队，还未毕业就提前成为军医了”。^{[24] (257)} 为防止泄漏机密，学校很少招收中国学生留校工作，能留校的中国人需要填写留学生登记表，作为留学生留校，留在这里工作需要加入日本国籍。

4、贡献于日本国策的医学研究。日本人曾讲，“疾病是日本殖民统治最大的威胁”。因此，“满洲医科大学”非常注重与满蒙开拓相关的保健卫生研究。然而，该校研究课题是随着时局变化逐渐推进的。“九一八”事变前，该校教授从卫生学、微生物学、病理学、营养学等领域研究日本移民如何定居“满洲”问题。“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日本侵占范围逐渐扩大，大量日本农业移民纷至沓来，该校便开始调查研究整个东北的风土气候，同时将流行传染病、地方病的研究列为重要课题。1933 年 6 月，根据厅令第 21 号，关东厅警务局卫生课内设置了“移民卫生调查委员会”，^{[25] (330)} 该会是负责开拓移民卫生审议的满洲国驻扎特命全权大使的咨询机关，其研究成果刊登在《满洲开拓卫生的基础》上。截至 1937 年，该委员会 26 名委员中，“满洲医科大学”在职教授、副教授 7 名，返聘 2 名，占绝大多数。委员干事小坂隆熊也是该校生理学教室助手出身，也是委员久野宁的弟子。可见“满洲医科大学”掌控着研究的主导权。同时，满铁卫生课也刊发了《满洲风土卫生研究概要》报告。殖民当局得出结论，日本移民健康状况不良是由于东北气温偏低所致。于是该校便在校内建造暖房、通风等实验房屋，研究日本移民适应东北气候的对策。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该校越发认识到开拓卫生的重要性，便在校内设置开拓医学研究所，旨在动员校长、教授及所有医务人员加强开拓保健的研究及实际生活的指导，并且随时刊发《所报》。该校选择性研究最终目标是“保护日人在‘异地’活动，即医学主要在研究异地风土气候，提供日人增强抵抗力的方法。”所以该校和“在满各卫生机构一样，医学研究的目的是贡献于国策”。^{[26] (362)}

5、以利用蒙古族人根本目的的巡回诊疗。自日本取得长春到旅顺间的铁道权益后，毗邻俄罗斯的内蒙古备受日本关注。当时，内蒙古地区经济还很落后，没有近代医疗制度，人们卫生意识也很低下，如果患病，只能接受喇嘛医的祈祷和治疗。1922 年，日本国策会社满铁在奉天创建了“满洲医科大学”。自 1923 年到 1938 年共计 16 年间，“满洲医科大学”先后向内蒙古地域派遣十五次巡回诊疗班，被施疗患者超过三万多人。^{[27] (211)} 每次实施巡回诊疗后，“满洲医科大学”都要刊发报告书。巡回诊疗班在各地实施宣抚医疗的同时，还帮助当地伪政府做卫生工作。如第九次诊疗班在齐齐哈尔施疗时，正值齐齐哈尔霍乱流行，施疗班访问当地野战医院，帮助警务厅长等伪满洲国 700 名官吏注射了疫苗。“满洲医科大学”的巡回诊疗也曾遭到很多爱国人士反对。1929 年到洮昂方向进行第六次巡回诊疗，遭到当地政府拒绝。虽然满铁直接出面交涉，但最终施疗班未能成功。“满洲医科大学”的频繁施疗给班员造成了严重灾难。班员“不习惯乘坐大车，摇晃，晕车、呕吐、食欲不振，或者由于酷热和臭虫影响无法入眠，或者不习惯吃当地东西。因此平均每天 20 人患眼病，还有很多人患其他疾病。”^[28] ⁽⁴⁾ 然而，“满洲医科大学”施疗自有其深远目的。一是怀柔、安抚蒙古族人，减少对日本人的反抗斗争；二是协助满铁的调查研究；三是挑拨蒙汉民族矛盾，拉拢蒙古族人；四是改善蒙古族人体质以供其驱使。

四、结语

在“以科学研究开发、利用满洲国资源”“于大东亚战争下展开科学战”^[29]

(32) 方针指引下, 为培养殖民医师, 调查东北历史地理情况, 操纵控制东北地区医学教育大权, 日本殖民当局在东北设立了“满洲医科大学”。在该大学存在的 34 年时间里, 以其目标的明确、齐全的专业吸引了许多对开发“满洲”怀有狂热梦想的日本学者和资深的科学家来到中国。不仅采取活体解剖、赴死刑场解剖、去墓地收集、接受奉天监狱死尸等残忍手段收集人体标本, 而且竭尽全力支持 731 细菌部队, 大量盗藏中国医学典籍, 为日本殖民统治培养活跃医师, 根据时局变化确立研究课题, 长期对内蒙古地域进行宣抚医疗。在他们的“奋斗”下, “满洲医科大学”在当时具有世界一流的水准, 而且培养出来的中国医务人员, 其中有不少人后来投身于革命, 为我国的医学事业作出了贡献。但在客观效果上, 他们起到了日本军国主义邪恶帮凶的作用。对于日本医学家们在中国东北的侵略罪行, 日本学者蒞昭三列举了“人脉、国家总动员体制、军学共同、医局讲座制——非民主的师徒关系, 将医学犯罪动机置于战争状态、军事秘密背景下, 因此不受伦理制约, 从事‘先端性研究’等这一功利主义, 确认自身社会地位等。”

[30] (21~22)

诚然, 在日本侵华期间, 很多医学家衷心效命于日本政府。然而, 这种违反伦理、人道的行为, 也被一些有良知的医学家所拒绝。如生理学者横山正松。横山是新泻医科大学毕业的生理学者。1944 年被召集到北京北支那军防疫给水部即甲 1855 部队。接受上级命令, 专门做小肠研究, “即使子弹穿过, 肠子也不漏, 做这样的药。为此必须做人体实验。”横山拒绝了上级命令, 结果被送往前线, 九死一生, 最终回到了日本。遗憾的是, 大多数日本医学研究者和军医都参与了国家组织犯罪。究其根本原因是一种民族歧视, 是对中国人的蔑视, 其中隐藏的是日本人的民族优越感。日本人也毫不隐讳概括殖民地医疗卫生特点是“日本人本位”、“利己的”。^{[26] (362)} 前文提到该校学生采取掘墓手段收集人体标本, 假如在日本, 学生们会去掘墓吗? 周围人会允许吗? 而这些医学家们犯罪没有罪恶感, 相反却认为是出色的行为。时至今日, 日本医学界仍然隐瞒过去医学犯罪的证据, 对过去的医学犯罪始终没有彻底反省, 更得不到历史教训, 因此重复相同错误的危险性很难明显减少。照此下去, 日本在亚洲只能陷入孤立。日本的正确做法是, 正视历史事实, 对加害的历史进行谢罪, 进行赔偿, 这样日本才能同亚洲各国融洽相处。

参考文献:

- [1][日]沈洁. “满洲国”社会事业的展开——以卫生事业为中心[J]. 社会事业史研究第 31 号, 2003.
- [2][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总裁室地方部残务部整理委员会. 满铁附属地经营沿革全史上卷[M]. 大连: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 1939.
- [3][日]小胎今朝治郎. 全满试验研究机构辑览[M]. 长春: 满洲帝国国务院大陆科学院, 康德五年.
- [4][日]中村哲. 后藤新平“日本殖民政策”一斑和日本膨胀论[M]. 日本: 日本评论社, 1944.
- [5][日]草柳大藏. 满铁调查部内幕(上)[M]. 日本: 朝日新闻社, 1979.
- [6][日]末永惠子. 战时医学的实态[M]. 日本: 树花舍, 2005.
- [7][日]满铁.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十年史[M]. 大连: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 1919.
- [8]后藤民政长官演说笔记. 台湾总督府医学校一览[C]. 台湾: 台湾总督府医学校, 1900.
- [9]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科院. 证言活体解剖[M]. 北京: 同文馆, 1991.
- [10][日]大野宪司. 支那人大脑皮质尤其后颈部细胞构成学研究[J]. 解剖学杂志, 1942 (6)

-).
- [11][日]竹中义一. 北支那人大脑皮质尤其侧头叶的细胞构成学研究[J]. 解剖学杂志, 1943 (1).
- [12][日]五十岚. 北支那人大脑皮质——尤其带转的皮质构成[J]. 解剖学杂志, 1944 (5).
- [13][日]久保久雄. 两小时解剖十二人——匪贼的末路[J]. 东京医事新志, 1934 (2900).
- [14][日]辅仁会·满洲医科大学史编辑委员会. 柳絮飞舞——满洲医科大学史[M]. 日本: 辅仁会·满洲医科大学史编纂委员会发行, 1978.
- [15][日]野村章. 殖民地成长的青少年[M]. 日本: 岩波书店, 1991.
- [16][日]本多胜一. 中国之旅[M]. 日本: 朝日文库, 1981.
- [17][日]铃木直吉. 因缘话[M]. 日本: 辅仁会·满洲医科大学史编辑委员会发行, 1978.
- [18]佟振宇. 日本侵华与细菌战罪行录[M].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1998.
- [19][日]真柳诚. 满洲医科大学旧藏古医籍的去向[J]. 日本医学史杂志, 2004 (50 卷 1 号).
- [20][日]《满铁图书馆的情况调查及印刷品的发放》, 出自关东厅:《本邦图书馆关系杂件》, 1929 年 10 月 18 日. 亚洲历史资料中心, B04012256600.
- [21][日]满史会. 满洲开发四十年史 (补卷) [M]. 日本: 满洲开发四十年史刊行会发行, 1964.
- [22][日]饭岛涉. 疟疾と帝国——植民地医学与东亚的广域秩序[M]. 日本: 东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23]孙玉玲. “满洲医科大学”与日军细菌战[J]. 东北沦陷史研究, 1997 (3).
- [24]齐红深. 见证日军侵华殖民教育[M]. 辽宁: 辽海出版社, 2005.
- [25][日]满洲开拓年鉴[M]. 昭和十七年. 藏于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满铁资料馆.
- [26][日]松村高夫. 满铁的调查与研究[M]. 日本: 青木书店发行, 2008.
- [27][日]伊力娜. 满洲医科大学内蒙古地域巡回诊疗[A]. 国际文化论集[C]. 日本: 桃山学院大学, 2009 年.
- [28][日]满洲医科大学诊疗团. 第一次蒙古巡回诊疗报告[M]. 大连: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 大正十二年.
- [29]王德歧. 科技侵略 铁证如山[J]. 科技史志, 1999 (1).
- [30][日]西山胜夫. 日本医学医疗对“15 年战争”的支持[J]. 社会医学研究, 2009 (26 卷 2 号).

原文出处:《日本问题研究》2014 年第 3 期

論日本對中國東北移民的侵略本質

沈海濤[☞] 衣保中[♣] 王勝今[♣]

沈海濤，吉林大學東北亞研究中心教授，文學博士；

衣保中，吉林大學東北亞研究中心教授，歷史學博士；

王勝今，吉林大學哲學社會科學資深教授，東北亞研究中心主任，文學博士。

內容提要：二戰前，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東北實施了大規模移民戰略，尤其 1931 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全面佔領中國東北地區後，陸續向東北派遣 30 餘萬日本移民。日本為了掩飾其戰略意圖和侵略行徑，把侵入中國東北的日本“移民團”改稱“開拓團”，企圖掩蓋日本移民侵略的本質。從日本向中國東北大規模移民及其移民政策的變化過程來看，日本向中國東北移民是上升為“國策”地位的国家戰略行為，是日本對中國東北地區實行殖民擴張的重要手段，日本“開拓團”本質上就是“殖民擴張團”。

關鍵詞：日本侵略；移民侵略；中國東北；“開拓團”

近年來，日本右翼勢力極力否認對外侵略擴張歷史，否認當年日本犯下的戰爭罪行，不斷通過右翼政客參拜“靖國神社”、篡改歷史教科書等活動，企圖推翻歷史結論，為日本軍國主義招魂。因此，我們有必要對日本侵華歷史重新梳理，正本清源，還歷史本來面目。

日本對中國東北實施的移民侵略，是日本帝國主義佔領中國東北進而實現大陸擴張侵略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日本對中國東北的移民侵略，號稱當年日本的七大“國策”之一，足見其在日本對外侵略擴張中的重要地位。然而，歷年來國內外學者在日本對中國移民侵略歷史的研究中，依然存在着名稱概念混亂、史實證據殘缺、本質認識模糊等諸多問題與缺陷。限於篇幅，本文僅從日本對中國東北實施移民侵略的視角，針對日本對中國移民侵略的名稱變化、日本移民侵略的本質與特徵等問題，依據日本侵華歷史資料進行整理分析，對相關研究中存在的問題拾遺補闕，揭露日本帝國主義對外侵略擴張的本質特徵。同時，也嘗試對日本右翼勢力錯誤歷史認識產生的歷史與文化根源進行剖析。我們在科學研究中應嚴肅對待外語歷史名稱的翻譯與使用問題，辨清是非，正本清源，堅持正確的是非觀與歷史觀。

一、歷史名稱與歷史假象

長期以來，在有關日本近現代史、中日關係史特別是日本侵華史研究中，有關歷史事件、制度名稱、群體（團體）稱呼等等，常常由於日本的歷史文獻資料中使用了漢字，因此在研究中很多日語詞匯便不加翻譯被直接拿來使用。這種“拿來主義”現象與近代以來漢字“逆輸入”現象的大量發生有着密切的關係，其功能作用和評價也比較複雜。然而，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是，在很多並非近代新造詞語逆向回流的情況背後，隱藏着文化帝國主義和後殖民主義的話語霸權以及日本掩飾對外侵略擴張的重大政治目的。主要關注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的文化話語權力關係的後殖民主義理論認為，相對於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主要是對經濟、政治、

☞ 沈海濤，吉林大學東北亞研究中心教授，文學博士。

♣ 衣保中，吉林大學東北亞研究中心教授，歷史學博士。

♣ 王勝今，吉林大學哲學社會科學資深教授，東北亞研究中心主任，文學博士。

军事和国家主权进行侵略、控制和干涉，后殖民主义则更强调对文化、知识和文化霸权方面的控制。美国学者弗·杰姆逊(Fredric Jameson)认为，“第一世界”掌握着文化输出的主导权，可以将自身的意识形态看做一种占优势地位的世界性价值，通过文化传媒把自身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编码在整个文化机器中，强制性地灌输给“第三世界”。而处于边缘地位的第三世界文化则只能被动接受，他们的文化传统面临威胁，母语在流失，文化在贬值，意识形态受到不断渗透和改型。^[1]

由于中国汉字在古代传入日本之后成为日本文字的主体部分，因此在日本历史文献中可以见到大量的汉字或以汉字为主的档案资料。这些历史文献资料在翻译成中文使用过程中，出于文义相通或文字相近，相当多的专有名词便原封不动地被拿来使用，有些甚至约定俗成地变成了“新汉语”和“新汉字”。毋庸置疑，这对推动汉语汉字的进化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即某些历史名词带有极强的时代和政治色彩，却依然被“不假思索”地照搬照用，如日本侵华时期的“从军慰安妇”、“开拓团”等用语。尽管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外语历史名称用语的“拿来主义”对研究活动和文化交流提供了某种便利，使中日文化学术交流有了“共同平台”。然而，这种不加分析和思考，甚至不加翻译地照搬照用，其带来的后果与影响不仅仅局限于语言文字领域，在客观上也带来了诸多不利于民族利益和国家大义的消极后果，对当时及以后的历史认识问题与国际关系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方面，无心的“拿来主义”和故意混淆是非、掩盖事实真相的做法，将使历史研究陷入后殖民主义语境与西方话语霸权体系的陷阱，在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领域受制于帝国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话语霸权，丧失我们的主体性和自我价值判断能力。在与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论争以及批判日本右翼势力错误的历史观与行动的过程中，许多时候我们处于被动的局面，其原因之一就在于面对日本右翼势力故意混淆历史概念、抹杀历史真相、颠倒是非曲直的言行，我们使用的语言“武器”很多是外国制造、日本制造，分析框架与原则规范都被纳入对方铺设好的“语境”之中。如何防止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受到现代帝国主义或后殖民主义实施的“隐晦的、文化道德的、知识的、精神方面的领导权”^[1]的控制，防止成为其思想文化上的附庸，就成为当代中国在文化建构与公众教育，特别是在日本侵华历史研究中建构起坚固的防御阵地，树立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和话语领导权的重要任务。

另一方面，这种行为和现象，客观上也为日本开脱侵略中国的战争责任提供了借口和可能。在后殖民主义话语权下，日本侵华历史给中国带来的是另一种无形的影响和深远的危害，造成文化意识上的错误认同，继而模糊、赞同日本右翼势力对其殖民侵略的粉饰与回避甚至否定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当今许多日本人无法正确认识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及其本质，助长右翼势力错误的历史认识泛滥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有关日本对中国移民侵略的历史研究中，“满蒙”、“移民”、“开拓团”等日本对中国殖民侵略扩张时期的官方用语有时甚至被不加引号地照搬使用，不仅有意无意地模糊和掩盖了日本对中国殖民侵略扩张的本质，也容易使相关研究走入误区，陷入单纯的人口移动研究，陷入简单的外来移民对中国东北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影响等形而上学的逻辑推理，进而对近代以来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时代特征做出错误的判断。因此，需要破除现有的、对本质认知存在干扰的假象。假象的东西是本质的一个规定，本质的一个方面，本质的一个环节。本质具有某

种假象。假象是本质自身在自身中的表现。[2]57 而在日本对中国东北移民侵略的研究中厘清本质与假象的关系,有助于在真正意义上形成对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本质特征进行全面、客观与深入的认识。日本军国主义在对外侵略扩张中,惯于使用词义暧昧、冠冕堂皇的词语,极力掩饰其战略意图和侵略行径。

“从军慰安妇”的真相与本质是日本对外侵略过程中日本军国主义强迫大量的日本、朝鲜和中国等国的妇女为日军提供性服务,是供其蹂躏压迫的“性奴”,与现代日本国内依然使用的“慰安”一词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该名称的使用,客观上掩盖了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反人类战争罪行的问题实质。而“开拓团”一词,则是日本军国主义在对中国东北实施移民侵略过程中炮制出来的一个专有名词。长期以来,不仅日本仍然延续使用这个名词描述日本移民侵略中国东北的历史,世界其他国家甚至我国学术界也在沿用这个名称。“开拓”一词本身带有褒义,开拓荒地、开拓新领域等等。如本文后面所述,日本军国主义把侵入中国东北的日本移民集团称作“开拓团”,就是企图把日本军国主义的移民侵略行径美化为开垦荒地,开发“满蒙”、“无主地”,建设“大东亚王道乐土”的经济开发行为。无疑,这一词语的使用与流传,掩盖了历史真相,我们必须加以澄清,揭开日本移民侵略的本来面目。一言以蔽之,在后殖民主义的“语境”和文化帝国主义的话语权下,不可能真正对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做出批判性的结论,无法真正认清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本质。

二、“开拓团”称呼炮制的背景与经过

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实施移民侵略由来已久。早在 1905 年日本侵占旅大后,日本首任“关东州”都督福岛安正就开始谋划对中国东北的移民侵略。1906 年,“满铁”第一任总裁后藤新平提出了 10 年内向满洲铁道移民 50 万日本人的移民计划。后藤新平在《关于大陆政策的根本备忘录》中强调了“向满洲移民的重要性”。时任日本满洲军参谋总长的儿玉源太郎也积极鼓吹“满洲移民”的必要性。可以说,在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走上近代资本主义道路之后,就把向中国大陆侵略扩张定为重要国策,中国东北地区成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首选之地,“满蒙雄飞”论逐渐成为日本国内主要的社会思潮。1914 年日本在大连建立了第一个“日本人移民模范村”——“爱川村”,1915 年迁入日本移民 19 户 48 人,翌年又迁入 13 户日本移民。[3]11 此后,日本在“关东州”和“满铁”附属地内陆续设立一些日本人移民实验点,迁入日本移民和安置“满铁”铁道守备队退伍士兵从事农业活动。由于受到中国的抵制,此时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的规模较小,局限于大连和“满铁”附属地范围内,收效不大。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全境沦陷,日本开始公然全面地推进向中国东北的移民侵略计划。1932 年 2 月,日本关东军制定了《移民方策案》、《日本移民案要纲》和《屯田兵制移民案要纲》等移民侵略的方针政策,开始具体实施对中国东北地区的移民侵略计划。日本拓务省也以加藤完治等人炮制的《满蒙殖民事业计划书》为基础,形成了《满洲移民计划案》。1932 年至 1936 年间,日本陆续进行了五次“实验移民”,向桦川、依兰、绥棱、密山等地迁入 2785 户日本移民。由于移民招募对象以日本“在乡军人”为主并按军队形式编组,配发武器,被称为“武装移民”。[4]44-56 [5]369

1935 年 5 月,日本拓务省在对已经实施的移民方案进行整合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满洲农业移民根本方案》,提出要在 15 年内向中国东北移民 10 万户的侵略计划。为此,日本在国内成立“满洲移民协会”,在伪满洲国成立“满洲拓殖株式会社”。1935 年 6 月,日本与伪满之间签订的《日本国满洲国关于满洲国日本臣民居住及满洲国课税等条约》及其《附属协定》中明确规定:“日本国

臣民可以在满洲国领域内自由居住往来和从事农业、工商业等其他各种公私业务与职务，而且享有关于土地的一切权利” [6]234。1936 年广田弘毅内阁上台，建立了以军部为核心的军国主义法西斯政权，把向中国的移民侵略列为七大“国策”之一，制定了《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案》，提出在 20 年内向中国东北移民 100 万户 500 万人的庞大移民侵略计划。该计划到 1945 年日本战败投降为止只推行了两期。从 1932 年 10 月到 1945 年 5 月，日本移往中国东北的移民总数达到 10.6 万户，32.2 万人。[3]13[4]45

日本向中国东北派出移民，一直使用“移民”的称呼。其间有“武装移民”、“分村移民”、“分乡移民”等等具体称谓。1936 年“百万户移民计划”成为日本七大“国策”之后，日本通过移民改变中国东北地区的民族结构，把东北彻底变成日本殖民地的图谋昭然若揭。日本为了掩盖其移民侵略的性质和目的，就授意伪满当局更改日本移民称呼。1939 年 2 月，伪满拓殖委员会事务局长稻垣征夫呈请伪满国务院总务长星野直树，认为“关于移民这一名称，即现在的名称，不能正确地反映满洲移民的实质，应重新选择适当的名称，以取代现有名称等见解，在有关首脑中曾屡次提出过。今年 1 月份在新京召开的移民恳谈会上，与会的各移民团长，曾一直表示希望早日改称，第八次移民团长会议，提出与上述相同的意见。今后，凡是与满洲移民有关的各种名称，不论其属于正式或非正式场合，一律按下列几方面加以修改。望从速下转各所属机关，按照此项统一规定切实执行” [7]61。要求将日本移民改称“开拓民”或“开拓农民”，将“移民团”改称“开拓团”，将“移民地”改称“开拓地”，将“移民政策”改称“开拓政策”。这实际上是一种欲盖弥彰的卑劣行径，日本移民进入中国东北根本不是搞所谓的“开拓”，而完全是一种侵略行为。[4]46-47 1939 年 12 月，日本颁布《满洲开拓政策要纲》，正式采纳了上述名称。自此以后，日本及伪满的文献中，把日本向中国东北的移民全部改称“开拓”，“开拓团”成为日本及伪满洲国对日本移民的官方正式名称。

日本把移民改称“开拓团”，完全是一种欲盖弥彰、掩盖其侵略用心的卑劣行径。如同日本将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称为“五族协和”、“王道乐土”，刻意掩盖其侵略罪行一样，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移民侵略同样包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险恶用心，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掩盖侵略罪行，缓解中国人民对日本移民侵略的反抗。“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地掀起反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民众斗争，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铁血军、抗日联军等，此起彼伏，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使日本的移民侵略未能达到预想的效果。1934 年 3 月“土龙山事件” [4] 94 爆发，当地中国民众奋起反抗日本人强夺农民土地的侵略行径，聚集了 14000 余中国农民，打死日军指挥官饭冢朝吾大佐为首的日伪军 40 余人，迫使日本不得不变日本移民的迁入地点。为了缓解中国人民的反抗，日本企图改用“开拓”一词，造成日本人不是抢夺中国农民既有的土地而只是开垦无主荒地的假象。

第二，欺骗日本民众，鼓动日本农民积极参与对中国的殖民侵略。积极鼓吹对中国移民侵略的加藤完治说：“我确信，把勤劳的日本农民移居到满蒙的天地，让他们开垦荒地，把匪贼横行的满蒙变成世界上的和平之乡，这是我们大和民族的使命。” [8] 日本军国主义为了鼓动日本人移民中国东北，还在日本国内掀起“大陆开拓文学”的潮流。在日本军国主义宣传鼓动下，“为了国家我们去了”成为当时日本移民中国东北的流行口号。除了流行“开拓文学”，大量纪录片、电影短片也成为鼓动日本人移民的宣传工具。纪录片《年轻的开拓者，满蒙开拓义

勇军》描述了“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的训练和生活。[8]为鼓励日本妇女嫁入中国东北，号称“满蒙开拓团之父”的东官铁男甚至还亲自作了一首题为《大陆的新新娘》的歌曲，命人组织传唱。

第三，蒙蔽国际舆论，减轻国际社会对日本殖民侵略行径谴责的压力。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略中国东北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在“国联”，尽管日本时任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国联”还是在 1933 年 2 月通过了谴责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国联报告书》。日本恼羞成怒，于 3 月 27 日退出“国联”，走上国际孤立的道路，一意孤行，扩大和全面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9]113-114 日本同英法美等西方列强的矛盾日益加深，尤其是美国也开始对日本予以经济制裁，禁止向日本出口废铁、航空油等物资，后来又对日本实施石油、钢铁等战争物资的禁运。为了摆脱国际孤立状态，缓解国际舆论压力，日本不得不通过各种方式掩饰其对华侵略扩张的罪行，把“移民”改称“开拓团”只不过是日本军国主义玩弄掩耳盗铃的文字把戏。

三、日本“开拓团”本质上是“殖民扩张团”

日本对中国东北实施移民侵略是一个长期的、不断变化的过程。其中，“移民”向“开拓团”的称呼变化，集中反映了日本对华移民侵略的复杂性和长期性的历史特征。日本刻意通过政府行为，更改“移民”为“开拓团”，有着模糊、掩饰日本对华进行移民侵略本质的险恶用心。然而，能够做出单独退出“国联”疯狂之举的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似乎并无必要过分在意国内外的舆论压力而对一个政策性群体名称进行调整，其更深层的原因和背景在于：

首先，将“移民”政策修改为“开拓”政策并确定为七大“国策”之一的举动，发生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际，并非简单地应对国内外舆论压力的一时之举，而是显示着对外侵略扩张战略调整的重大意图。众所周知，日本自明治维新实现向近代国家转型之后，“海外雄飞”，向中国大陆侵略扩张就一直成为日本国家的根本发展战略。“移民”只是单纯的经济意义上的人口迁移，虽然也有国家有意识地输出口，有组织地向海外移民扩张的意图，但尚缺乏战略意义上的国家意志的体现。而当向中国东北“移民”政策成为广田内阁的“国策”之后，“移民”政策就被赋予了更多的战略意义。“移民”一词已经不能够表达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和深远图谋了。“开拓”一词，原本就有开拓疆土、扩展领地的含义，也是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国家长远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之一。作为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的“国策”之一，“满蒙开拓”所涉及的范围和内容已经远远超出之前所进行的局部的有限的移民政策了。日本“开拓团”肩负着日本对外殖民扩张的国家使命，是一种国家战略行为。[10]472-473 1896 年 4 月，日本政府为了殖民统治台湾而设置了拓殖务省，1910 年设置内阁直属的拓殖局，1929 年升格为拓殖省，负责海外殖民事务。[11]1936 年 8 月，“百万户移民计划”成为日本政府七大“国策”之后，同时也授意伪满当局把移民政策列为它的三大“国策”之一。这个计划目的在于要在 20 年后伪满洲国推定的 5000 万人口当中，日本人占其一成，成为所谓“五族协和”的核心和主导民族。为了推进移民侵略，日伪当局不仅设置了“满洲移住协会”、“满洲拓殖株式会社”、“满洲拓殖公社”、“满洲拓殖委员会”、“满洲土地开发株式会社”和“开拓总局”等侵略机构，1939 年又制定了被日本殖民主义分子视为从事移民侵略“最高宝典”的《满洲开拓政策基本要纲》。1940、1941 年日本更制定了合称“开拓三法”的《开拓团法》、《开拓协同组合法》和《开拓农场法》，为日伪推进移民侵略的“国策”提供法律保障。因此，“移民”向“开拓团”的名称变化，不仅仅是为了掩盖日本对华侵略扩张

的本质特征，更是一种对华侵略战略上的调整和殖民统治政策的变化。

其次，日本对华移民侵略不仅是军事侵略和经济侵略的产物和政策，更是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实行殖民统治的重要手段和制度机制。在日本推行向中国东北移民扩张政策的过程中，移民政策通过向“开拓团”的蜕变，已经演变成与“满铁”的经济扩张、关东军的军事占领以及伪满洲国的傀儡政治并行的殖民统治机制。通过对“百万户移民计划”的重新解读，可以看出当时的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已经对帝国主义殖民理论有了较为充分的认识，其对 20 年后 500 万移民与 5000 万东北人口的比例估计，也表明了日本军国主义长期霸占中国东北，将中国东北彻底变成日本一部分的长期战略目标。日本“开拓团”的性质，用日本军方的说法，是以人口增长完成“实力的培植”。日本关东军在《对满移民的全面方针和移民计划案》中认为，日本在日俄战后之所以没有实现对“满洲”的完全统治，其原因就在于“没有采取增殖邦人手段而放任自流，导致无日本人实际势力存在的结果。……因此，今后务必要把培植我之实力放在第一位”[5]11。从长远目的来说，使日本人在中国东北“永久性地住上 500 万到 1000 万”[12]，这样，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东北地区的民族构成和人口结构，日本人将成为中国东北地区占主导地位的民族，东北地区将成为日本的永久殖民地。

1931 年以后，伪满当局、“满铁”等“国策”企业成为日本实施移民侵略的主导机构。日本政府、伪满当局、“满铁”，三者扮演着共同而有区别的政治角色，在组织派遣移民与支援移民迁入及其管理等方面发挥着各自不同的作用。最新发现的历史资料表明，日本通过移民对中国东北地区进行殖民统治的特殊形态明显有别于日本在台湾地区、朝鲜以及其他占领地区实施的统治形态。在东北地区，日本军国主义把日本人、朝鲜人和白俄人等移民集团依据统治需要进行调配，分割控制当地原有的中国居民并不断制造民族摩擦，使其相互牵制和相互制约。“五族协和”的本质就是日本人包括日本移民集团居于核心领导地位，掌控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金字塔状”的统治结构。以日本实施移民侵略过程中的土地抢夺为例，日本的“开拓团”从来就没有进行过所谓的“开拓”土地的活动。不仅所谓的“开拓地”绝大部分是从中国人手里抢夺来的熟地，无需再进行“开拓”，甚至这些土地被日本人强占后也不是由日本人耕种，而是租给或雇用中国农民耕种。日本移民实际上成为当地的统治阶级和太上皇，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进行殖民统治的工具。这一点，甚至连当时的日本人也不得不承认，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移民政策，“或资国人之发展，非法侵害满人利益，上下驱于优越之感”，已经招致中国人的反感，酿成“反日思想”。[13]46 日本为了大规模向中国东北移民，不断加紧对东北土地的掠夺，除将没收的国有地、官有地以及“逆产地”、“地主不明土地”直接划作移民用地外，还强行从中国农民手中“收买”土地。而所谓的“收买”，有的地方实际是熟地和荒地平均后定价为 1 元，等于无偿掠夺。如 1933 年日本第一次武装移民移住桦川县永丰镇，将该镇的 99 户、400 多名中国农民全部逐出并掠夺该村全部土地。据不完全统计，到 1941 年，日本殖民统治者以移民用地的名义占夺东北土地达 2000 多万公顷，是当时日本国耕地总面积的 3.4 倍。[14]364 而且日本移民大多把土地出租或者雇用中国农民耕作，自己变成坐收渔利的殖民统治者。因此，日本移民只有“开拓”之名而绝无“开拓”之实。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绝对不是普通的人口移动，而是日本实施殖民侵略扩张“国策”的主体。1934 年 11 月日本关东军参谋长西尾寿造在“对满农业移民会议的开幕辞”中公开声称：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与日本国向其他国家移民相比，具有不同的宗旨和意义”[15]12。因此，为了特别表明日本对中国东北

移民侵略的特殊性，也有必要在移民集团的名称上体现出“开拓进取、开辟满蒙新天地”的“积极”色彩。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矢内原忠雄更是直言不讳，称“满洲移民并非经济型移民”，“向满洲移植日本人使其作为民族发展之地，永久确保日本的权益，并作为日本的外围前哨以图发挥政治的军事的”作用，“满洲移民问题就是从这个所谓国家的见地出发被提上日程的”。[10]473 可以断言，移民是一种特殊的日本对外殖民扩张的统治形态，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采取的特殊统治制度与机制。

再次，应从日本国内政治社会变化与对华侵略扩张政策变化的相关性角度，重新认识日本对华殖民侵略的多重性，从日本近代对外侵略扩张的总体格局中重新认识移民在日本对中国东北进行军事扩张和殖民统治中的特殊地位与作用，从根本上纠正日本人错误的历史认识。

1937 年“七七事变”以后，日本面临深陷中国大陆战场，同时又不得不对美英等国压力的困难局面。但尽管在战时兵员紧张、国内劳动力紧缺的形势下，日本政府依然坚持实施向中国东北移民的政策计划，足见其移民侵略政策的战略性、特殊性与计划性。1937 年 7 月，日本关东军制订了《满洲国中药产业统治法案》，提出了“产业开发、北边振兴、开拓移民”的三大“国策”。“满洲国产业部次长”岸信介公然主张，“通过经济统制，每年满洲国要向关东军提供 2900 万吨煤炭、150 万吨铁钢、1000 万吨粮食，为此，必须要收买满洲国的可耕作土地的四分之一，即 1000 万公顷的农地”[16]27，由此开启了大规模的掠夺中国东北土地的侵略活动。

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移民侵略前后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变化，不仅与日本国内经济政治和社会变动相联系，也同日本与苏联关系的变化、同东北地区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形势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各个战场的军事形势变化相呼应。在伪满档案中，对此有明确的说明：“以支那事变（七七事变）为转机，苏联对中共东北党（军）之谍报谋略工作明显加强，从过去一年（1937 年）由许多证据可以看清。另外，在此期间可以认为从苏联方面（哈府军司令部）对中共东北党（军）之策动支援，已达到相当顽强且深刻之程度”[17]4。因而，日本对中国东北实施的移民侵略带有显著的时代性特征，是与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扩张的战略同步进行的。

在 20 世纪 30 年代前期的武装移民时期，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移民侵略目标，重点在于满足“整治治安不良”的东北占领初期的军事与政治统治的需要，把日本移民作为“治安维持协力者”进行组织和利用。从 1932 年至 1936 年日本政府进行的五次武装移民，基本上都是出于同一个目的，即镇压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巩固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军事占领。从“屯田兵”、“屯垦军”、“特别移民”等名称上也可以看出这个时期日本移民侵略的基本性质和任务。1937 年以后，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移民侵略进入了“国策移民”阶段，不仅移民的募集由原来的以“在乡军人”为主向一般农民为主转变，日本移民政策的指导思想也发生变化，转向利用移民对东北进行殖民统治，把东北变成扩大侵略战争的后方基地，甚至使之成为日本的一部分。日本移民的作用从“狭义的国防机能”转变为“广义的国防机能”，日本移民侵略政策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日本“开拓团”的大量移入，本身就具有建设“活人堡垒”工程的使命。“百万户移民计划”的目标绝大部分都是部署在东北抗日联军的游击区和漫长的中苏边境地区。为了强化“开拓团”的军事功能，1938 年以后日本把向中国东北派遣“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作为“充实满洲国防的第二线”和镇压中国人民的重要警备力量。通过移民“开拓团”的统治，日本对中国东北殖民侵略扩张的军事色彩被建设“五族

协和”的和平假象所掩饰，“开拓团”部分代行了日本关东军在平时的军事统治职能，在战事紧张时又直接变成了日本侵略军的预备队和别动队。军“民”同时向中国东北推进，在战事压力小的时候，便以武装移民为主，军队为辅；战事紧张时，军队为主，移民转换为军事预备队和辅助力量。大量的历史资料与研究成果证明了日本在 20 世纪 30—40 年代“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地向中国东北进行移民侵略的事实”[18]10。因此，“移民团”向“开拓团”的变化，并不仅仅是单纯的名称变化，它不仅掩盖了日本对华侵略扩张的本质特征，更体现出一种对华侵略战略上的调整和殖民统治政策的变化。

四、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初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日本为了掩饰对中国东北开展大规模移民的侵略行径，把日本“移民团”改称“开拓团”，从此“开拓团”成为二战前日本对中国东北移民的正式名称，一直沿用至今。该名词的引用并流传掩盖了日本移民的侵略本质，我们应该重视和纠正以往研究中不加甄别地照搬引用日文专有名词问题。名称用语的“拿来主义”，将使日本侵华史研究陷入后殖民主义语境与西方话语体系的陷阱。在后殖民主义的话语权下，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语境”当中，将无法真正认清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本质，客观上为日本侵华历史开脱责任。

第二，日本向中国东北派出移民，一直使用“移民”的称呼，其间有“试验移民”、“武装移民”等称谓。1936 年日本提出“百万户移民计划”并成为日本七大“国策”之一后，日本通过移民改变中国东北地区的民族结构，把东北彻底变成日本殖民地的图谋昭然若揭。日本为了掩盖其移民侵略的性质和目的，就授意伪满当局更改日本移民称呼，1939 年正式把“移民团”改称为“开拓团”。日本之所以模糊概念，混淆视听，就是企图掩饰对中国东北移民的侵略本质，以缓解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的反抗，鼓动日本民众支持并积极参与其殖民扩张战略，蒙蔽国际舆论以减轻国际社会对日本殖民侵略行径的压力。

第三，从日俄战争后日本开始在旅大及“满铁”附属地设立试验移民点，到“九一八”事变后推行“武装移民”，日本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又炮制了百万户移民计划并上升为日本七大“国策”之一，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的侵略本质也日益暴露。日本对中国东北移民政策的演变轨迹表明，日本“开拓团”肩负着日本殖民扩张的国家使命，日本“开拓团”绝不是普通的人口移动，而是带有鲜明武装力量或准武装力量色彩的侵略工具，更是日本在中国东北推行侵略扩张和殖民统治的重要支柱和手段。因此，日本“开拓团”，本质上就是殖民扩张团。

【参考文献】

- [1] 王岳川：《后殖民主义的历史语境与当代问题》，<http://www.aisixiang.com/data/6923.html>，2014 年 2 月 20 日。
- [2]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 年 9—12 月），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年。
- [3] 杜颖：《跨越战后——日本遗孤问题的历史与现实》，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2 年。
- [4] 王胜今：《伪满时期中国东北地区移民研究——兼论日本帝国主义实施的移民侵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年。
- [5] 满洲移民史研究会编：《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移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 年。

- [6]浅野丰美、松田利彦编：《殖民地帝国日本の法的展开》，东京：信山社，2004年。
- [7]黑龙江省档案馆、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黑龙江省档案馆藏，1989年。
- [8]《侵华日军的帮凶日本开拓团》，<http://www.meyet.com/thread-259348-1-1.html>，2014年4月14日。
- [9]宋志勇、田庆立：《日本近现代对华关系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
- [10]浅田乔二：《日本殖民地研究史论》，东京：未来社，1990年。
- [11]秦郁彦编：《日本官僚制综合事典：1868—2000》，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01年。
- [12]堪旭彬：《为什么是方正县在为日本人立碑》，<http://act3.news.qq.com/5105/work/show-id-70.html>，2011年8月4日。
- [13]辽宁省档案馆编：《日本“对外同志会”关于“对满策建议案”（秘件）〈溥仪私藏伪满秘档〉》，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0年。
- [14]喜多一雄：《满洲开拓论》，东京：明文堂，1944年。
- [15]满洲经济调查会编：《满洲农业移民方案》，第2编第1卷第2号，满洲经济调查会，1934年。
- [16]熊达云：《过去的事实是怎样被描述的？——关于“满洲事件”与“满洲国”》，《解剖“创造会”的历史教科书——在日中国人学者的视点》，东京：日本侨报社，2001年。
- [17]吉林省档案馆编译：《伪满档案史料选编：东北抗日运动概况（1938—1942）》，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
- [18]王胜今：《论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移民侵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本质的新视角》，《东北亚论坛》，2001年2期。

原文出处：《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3期第5~12页

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中国叙事”再考

潘世圣*

内容提要：“人力车夫”和“城市街景”，是《满韩处处》与《支那游记》之“中国叙事”的典型场景，其中对“污浊”“混沌”“无秩序”等负面元素的描述颇为醒目。不少文献资料证明，此种“中国像”并非特殊的个人记忆，而是东洋“他者”的某种共同记忆。在这类“中国叙事”结构的背后，作家对中国古老文明文化的憧憬想象与目睹现实的乖离、日中两国社会现状的巨大反差，加剧了作家对中国的负面感知；近代以来世界性的中国话语建构、特别是“东方主义”观念也参与其中，限制了作家理解亲近中国的内在欲望。“绅士”式的矜持和优越感令他们难以摆脱居高临下的姿态，完成对中国的深刻体悟；而近代帝国列强的殖民欲望、脱离文明驾驭的霸权强权方式，也深刻地嵌入在时代背景中，潜在地发挥着作用。

关键词：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中国叙事”/写实与暴力

夏目漱石(1867-1916)和芥川龙之介(1892-1927)，日本近代文学中最有高度和个性的小说家。两人年龄相差 25 岁，芥川是夏目为数不多的弟子之一；夏目是日本人引以为骄傲的明治时代(1868-1912)的文豪，芥川则活跃于近代思潮泛滥的大正时期(1912-1925)；两人出身名门东京帝国大学，学的都是英美文学；两人都以小说见长，尤其善于洞悉人的心灵世界，但夏目多长篇，可见道德忠诚的明治气息，芥川执着于精美的短篇，喜欢烛照人间的灰暗本性，两个人的小说都不算欢快明朗，但却有真挚和睿智。明治和大正时代，日本空前发展，国富兵强，而中国恰恰遭逢历史上最不幸的时期，饱受列强掠夺和摧残。正是在那个时代，夏目和芥川先后来过中国。

1909 年秋，夏目应老同学老朋友、“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1906-1945)总裁中村是公(1867-1927)邀请，赴“满洲”(东北地区)各地参观访问 20 余日，发表了游记《满韩处处》。12 年后的 1921 年春，不满 30 岁的芥川以大阪每日新闻社海外视察员的身份来华观光视察，历时三个多月，遍游上海、苏州、杭州、南京、九江、汉口、长沙、洛阳、北京、大同和天津等地。回国后，陆续在报刊上发表游记，1925 年出版单行本《支那游记》(东京：改造社)。

对中国人来说，两位作家笔下的中国让人感慨万千，它不是秀美的山河，不是温良敦厚的人情礼仪，不是丰衣足食的民间生活，不是明净宜人的空气，不是整洁有序的大街小巷，而是充满肮脏污浊、浑迷混沌、贫穷堕落、无赖痞气、愚昧无知的昏暗世界。特别是以“人力车夫”为代表的“中国人像”和城市街景，构成了夏目和芥川、乃至日本近代文人独特的“中国印象”或“中国记忆”。

本文关注两位作家的“中国记忆”，从个人视角出发，发掘使用新的文献资料、或过去人们忽略的资料，通过文献实证重新考察夏目和芥川的“中国叙事”，期冀为学界提供一点思考的材料和视点①。

一、负面元素：文豪们的“第一印象”

先看两个文本有关“中国”的“印象”“记忆”和“叙述”。

《满韩处处》篇幅不长，中文译文不足百页。夏目到“满洲”旅行，他的“中国”意识并不强。当时“南满铁路”沿线是日本的管辖势力范围，很多日本人来

* 潘世圣，男，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日语系教授。

到“满洲”“开拓”，他们把日本叫做“内地”，而称“满洲”为“外地”。②夏目的行程活动基本都在“满铁”、也就是日本人的安排和范围中进行。所以，夏目的观光旅行不是完全意义的“中国之行”。在他的意识中，有时是在“中国”，有时是在“亚日本”，呈现一种复杂情形。

夏目乘坐的客船“铁岭丸”③在大连靠岸，按他的记述，他对中国的第一印象确是那种特别的气氛：

船横着，准准地驶到那宛如饭田河岸的石壁旁，让人想不到这是大海。河岸上聚集着很多人。不过大多是支那的苦力。单个看脏兮兮的，两个人凑到一块儿，看了更不舒服，而象这样成帮结伙的，愈加不堪一睹。我站在甲板上远远俯瞰这一堆人，心中不禁慨叹：这船真是来到了一个妙处啊！（中略）船缓缓地侧停在那群苦力面前。不管船停好没停好，苦力们就象发怒的蜂窝一样，吵闹动作起来。（中略）

……朝河岸上望去，果然有成列的马车。还有许多的人力车。可是，拉人力车的都是那些吆喝吵闹的家伙，和日本国内比较起来，实在是不好看。驾馭马车的车夫也多半和他们一样熙熙攘攘、闹闹哄哄的。看来，这脏兮兮的感觉实在是来自这嘈杂的喧闹。

这儿的关键词是“苦力”“人力车夫”“脏、乱、吵”。

12 年后的 1921 年，芥川乘坐“日本邮船株式会社”的“日华联络船”“筑后丸”，从日本九州北端的门司港启程，9 月 6 日抵达“日本邮船”株式会社在上海专用的“汇山码头”。和漱石一样，芥川踏上中国的土地，受到的第一个冲击，也是“人力车夫”：

一出码头，几十个黄包车夫一下子就将我们团团围住。我这里说的“我们”，便是我、以及我们大阪每日新闻社的村田君和友住君、还有国际通讯社的琼斯君。说到黄包车夫一词，在我们日本人的印象里，决无那种脏兮兮的感觉，反倒是车夫的健壮和十足劲头，令人不禁回想起江户时代的风情。可眼前的中国的黄包车夫，简直可以说就是肮脏的代名词。一眼扫视过去，个个都是一副怪相。车夫把我们围得水泄不通，前后左右，尽是伸将过来的车夫们的脸，他们大声地喊叫着。一位刚刚上岸的日本女人显得很惶恐。我也一样，当一个车夫扯拽我的袖口时，我不由躲到了人高马大的琼斯君身后。（《上海游记·二第一印象（上）》）

接着，是马车车夫。年轻的车夫急躁而粗鲁，“马车刚起步，那马就冒冒失失地撞在了街角的砖墙上”，到了目的地，车夫又为车钱讨价还价，“迟迟不肯缩回那只接了钱的手。看样子是嫌车钱给得太少。不仅如此，马车夫还连珠炮似的在说着什么，直讲得口角上泡沫飞溅”。包括“马车车夫”在内的初到上海的“第一印象”，显然颇不愉快。但作者强调：“遗憾的是，它确实确实也是中国给我的第一印象。”④

夏目、芥川对中国（大连和上海）的“人”和“城市风景”的第一印象的感受要点是一样的。它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物理性、视觉性的静态印象：“污浊”“肮脏”；二是包含了听觉和感觉的动态性印象：“吵闹”“无序”“混乱”和“混沌”。这些性质不同的东西混杂一起，构成了生理和心理的不快感。所以夏目说：“这脏兮兮的感觉实在是来自这嘈杂的喧闹”。这是来自另一个生活空间的异域他者所感受的“不适”，也包含了西方“中国话语”的某种延长。面对两位作家的感受和叙述，读者的心态十分沉痛。但在当今 21 世纪的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中，情绪化的极端反应并不多见。只是，有时人们还是习惯于或轻描淡写地批评他们对中国不够友好，或避重就轻顾左而言它。有不少研究从“东方主义”

(Orientalism)理论视角出发,阐释《支那游记》中的“中国描述”“中国形象”。认为这些作品中出现了不少“负面意象”,即“20世纪初半殖民地中国贫穷混乱的现状和肮脏愚昧的国民”^⑤;所津津乐道的大多是“支那”和“支那人”落后、颓废、粗俗、脏污、贫穷等“丑陋”的一面——尽管亦是事实——以致在当时就引起了巴金等人的反感和批驳,等等。显然,这种欲言又止的态度和处理方式中,既有中国人长久的创伤隐痛,也有带有惯性的思维路向,凝缩着历史文化的积淀和矛盾。

二、“普遍性”:东洋“他者”的共同记忆

夏目和芥川的“中国叙事”并非单独的或特殊的个案,在同一脉络上,还有不少类似的“记忆”和“叙事”,如近年由中华书局推出的系列翻译《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就一批数量庞大的纪实性文本。在笔者个人搜集的资料中,也有另一些意味深长的“另类”文本。

其一,和夏目、芥川这些明治大正时代的自由主义作家不同,日本近现代还发生过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对中国的革命以及无产阶级文学有过极大影响,在那些信仰社会主义、主张推翻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左翼”作家中,有一位叫鹿地亘(1903-1982)的人物。他与中国关系极其密切,具有日本共产党党员、左翼革命家、社会活动家、文艺活动家、小说家、评论家以及中国文学翻译研究家等多重身份和背景。从1936年到1946年的10年间,鹿地一直生活在中国,其中,从1938年起,协助国民政府进行各种形式的对日反战宣传活动,参与对日宣传、策反以及教育日军俘虏等工作。他还是鲁迅的朋友。鹿地因参加和领导日本左翼革命运动及文艺运动,多次被捕坐牢,后为逃避日本警察的监视和迫害,于1936年1月逃亡来到上海。笔者在调查1930年代的日本杂志《文学评论》时,发现了鹿地来中国后写作的题为《上海通信》的三篇文章:《上海通信(一)》(东京:《文学评论》第3卷第3号,1936.3)、《上海通信(二)》(《文学评论》第3卷第4号,1936.4)、《上海通信(三)》(《文学评论》第3卷第6号,1936.6)。非常珍贵的是,这些文章具体详细地记述了作者的“上海印象”,包含着富有价值的多重信息。

那么,上海给我们的日本左翼战友的第一印象究竟是怎样的呢?

城市给我一种灰黯的印象。从船上放眼上海,虽无东京一般净朗,但远远望去宛如凹凸剧烈的锯齿一般装扮着天空的近代建筑,确为日本的都市所不及。在这风景中,可以感受到繁盛和动感,更可以感觉到繁盛和动感所具有的一种明快。不过,一出了码头,刚才的印象便一下子被破坏掉了。呈现在眼前的是,古旧的红砖建筑物如高墙一般挟着仿佛跌落在谷底的道路,让人猜不出两边的高墙后面发生着什么。在来来往往中,街区的每一个区域仿佛都被高墙保护着,湿淋淋脏乎乎的沥青道路上往来的人流,仿佛是被无数的人家和街市赶出来的一般。更严重的是,当我被卷入到这不安的人流的一瞬间,忽地朝我袭来的,是数十人黄包车夫的人群。就是中国的人力车夫。就是芥川龙之介在《上海游记》里描写的车夫。他写道:“说到中国的车夫,说他们是污秽的代名词并不夸张。放眼一看,个个都是一副怪怪的样子。他们围在你的前后左右,个个伸着脖子大声喊叫着,吓得刚上岸的日本妇人战战兢兢的。当一个车夫拽我的外套的袖子时,我不由地退到身材高达的A君的背后。”就是这些车夫,人们对他们抱有先入之见,甚至轻易地把他们和盗贼劫匪联系在一起。朋友一直提醒我:“去了上海,不要一个人外出走路,不要在不安全的地方坐人力车。”我也害怕在这冬日里被弄到什么地方,被扒光衣服,更何况眼下正是抗日气氛高涨的时节。于是,当一齐涌过来

的车夫中，猛然有人要向我的旅行箱伸手时，我也不由地象芥川一样一边心中发虚，一边壮起胆子朝他们大喝。（《上海通信（三）》）

鹿地巨特别注意到上海存在着两个世界，一个是外国人居住的“租界”，一个是华人居住区。两个世界截然不同，租界里的道路是平坦宽阔的柏油路，沿街是傲然屹立的欧美近代建筑；而华人区到处是凹凸不平的狭窄的石子路，阴暗潮湿，一片脏污。在鹿地眼里，“这些华人街简直就是被租界所包围的小岛”，“是被近代大都市所包围的特殊部落”。他哀伤地慨叹这是“反差至极、充满暗示的风景”。

夏目访华是 1910 年代、芥川是 1920 年代，而鹿地则是 1930 年代。然而，他们对上海的第一印象依旧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其二，在笔者搜购的日本资料中，《从日本前往支那》（原名『日本より支那へ』，东京：北隆社，1924 年）这本旅游指南书非常有趣。此书出版于 1924 年，编写时间正好应该在芥川来沪前后。书的作者叫后藤朝太郎（1881-1945），早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中文专业，后来成为语言学家、大学教授。此人曾多次来中国访问、生活，精通汉语，熟知中国的社会文化和风土人情，编写过有关中国的书籍达 110 余种之多，为众多读者广泛阅读，被誉为昭和（1925-1989）初期“中国通第一人”。他这本书以如何乘坐“神户（经门司、长崎）——上海”这条重要海上专线客船赴中国旅游（芥川来华时即利用该航线）为内容。其第六章《登陆上海》主要介绍上海及其周边情况，作者说上海是一个“天上”和“地上”并存的都市，它既有“世界上最污秽的苦力们”，又有“看上去简直就是世界上最美的女神般的洋装美女”。而第二节题目为《提防不良车夫》，专讲不良车夫，提醒游客小心。

总之，透过以上的种种例子，可以说，本文所关注的两个场面所代表的“中国印象”“中国见闻”确实不是特殊的，也不是个别的。就是说，夏日和芥川的“人力车夫”“城市街景”并非极端的个人感受，而是那个时代东洋他者的“共同体验”和“普遍记忆”。

三、毋需扭捏：“中国叙事”建构的现象真实

上述“他者”的中国体验、中国记忆以及中国叙事体现为主观和客观的混合，必然的参与到近代西方世界（包括日本）的中国话语建构中，同时他们自己也处在一个被建构的过程。他们的“中国叙事”无法摆脱同一系谱的各种话语的影响。以夏日和芥川来说，除了他们的“先辈”的话语浸渍，还有欧美的影响。例如笔者在调查日本近代综合杂志《太阳》（1895-1928）时，曾发现一则小文《各国人的气质》，说一位欧洲自行车旅行家周游世界，对世界主要国家国民的特性进行概括，结果是：匈牙利人最富有热情，俄罗斯人多疑猜忌，波斯人讲究迷信，印度的英国官吏最倨傲，缅甸人最温顺，中国人肮脏，日本人自负等^⑥。这种颇有“定性”嫌疑的西方世界的“中国话语”，被选出来发表在影响力最大的杂志上，体现了日本与西方中国话语的合流或共鸣，构成了带有权力色彩的支配性话语。这是夏日和芥川的“话语”背景之一。

然而，作为被记忆被叙述的中国人，应该如何接受“他者”对中国负面因素的叙述，至今还是一个未完成的课题。在《满韩处处》，特别是《支那游记》文本中，1910、1920 年代初期的中国，殖民空间和本土空间并存，充斥着衰败、黯淡、浑沌、鄙俗、腐朽、肮脏这些令人不快的元素，显示这样的中国既是作者的一种感官印象，也是一种情感的道德的判断。面对这些来自东洋人的负面描述，单纯的愤慨意气 and 抗拒反拨是不恰当的。将客观现实和道德情感分开，除了民族

自尊和自卫的激情，可能更需要理性的民族自我认识，特别是民族的自我省察和批判勇气。

回顾历史，夏目和芥川访华的 1910、1920 年代，正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极端不幸的悲惨时代。晚清不必说，即使是芥川来华的 1920 年代，虽然“中华民国”诞生已 10 年有余，但中国大地依然处于军阀割据、四分五裂、民不聊生的纷乱状态。国家的基本统一尚未实现，国家的系统建设，无论是物质文明、制度建设、还是民风习俗、公共道德，都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时期。无数仁人志士面对国家民族的不幸局面，每每发出焦急的呐喊。鲁迅(1881-1936)抨击中国社会的腐朽堕落和中国人的“劣根性”，怕“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⑦；说英国人称中国人为“土人”，“他们以此称中国人，原不免有侮辱的意思；但我们现在，却除承受这个名号以外，实是别无方法。”^⑧闻一多(1899-1946)1925 年从美国留学回国，面对阴暗沉寂的故国家园，竟然在诗歌《死水》中发出惊人的悲鸣：“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⑨在《发现》一诗中，更是情不自禁高喊：“我来了，我喊一声，迸着血泪，‘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我会见的是噩梦，那里是你？那是恐怖，是噩梦挂着悬崖，那不是你，那不是我的心爱！”这既是诗人的郁愤绝望和痛苦情绪，也是那个时代中国残酷现实的真实写照。

比起远离历史有百年之遥的今人，亲身经历着那个时代的国人对这类“他者”作品的认知和处理方式，显得非常理性。1925 年 11 月，《支那游记》结集出版之后，作家夏丏尊(1886-1946)马上便在上海的日本书店里买到该书，挑选若干节译成中文，冠名《芥川龙之介氏的中国观》，发表在《小说月报》上。他在译者记中说：“果然，书中随处都是讥诮。但平心而论国内的实况，原是如此，人家并不曾妄加故意的夸张，即使作者在我眼前，我也无法为自国争辩，恨不得令国人个个都阅读一遍，把人家的观察做了明镜，看看自己究竟是什么一副尊容！想到这层，就从原书中把我认为要介绍的几节译出。”^⑩1927 年 9 月，芥川自杀仅一个月后，《小说月报》编辑了芥川龙之介专号，刊登其小说、小品文等作品。郑心南(1891-1969)著文《芥川龙之介》，介绍了作家的一生及其创作。在论及芥川以中国为题材创作的作品时，文章指出：这类作品“都是采我国的材料。虽然文词之间，含不少的讥刺，但这是他对于现社会不满足的表现，即我们也常有同感，不能以他是异国人便认为有意轻蔑。而况他对于本国社会的讥刺，更来得厉害呢！”(11)在当时，理性的读者和评论家都爽快地承认《支那游记》的记述，乃是自己身边的中国社会现实状况的真实写照，它象一面特殊的明镜，可以帮助国人自省，更好地认识自己的国家。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不能因为话是出自外国人之口，便抗拒恼怒。上述评论表现了一种健康理性而客观的心态。后来虽然有人表述过一些不满的意见(12)，但同时也声明那不过是“自尊心的单纯直觉的发生”，“如果我们把芥川氏所提出来的来看，当我们承认那是事实的时候，我们便会默默忍受的”(13)。这也是一种很诚实的态度，值得尊重。

今天，假若是出于“自尊心的单纯直觉的发生”，而责难夏目和芥川的作品的某些方面，绝不为过。但如果因为言者是外国人、是日本人，因为他们写了一些令人不爽的负面内容，便回避历史事实，回避民族的自我反省的话，那就不够理性了。我们要承认，夏目和芥川作品中的许多记录，就是他们的所见所闻，至少在物理性物质性世界的形态上，他们的“中国叙事”的表象部分有许多是真实的。而之所以他们的感触会比中国人加倍的强烈鲜明，原因之一是他们那里存在的两个“落差”：一个是以往人们关注过的纵向落差。就是作家在长期经受中国

古典文化的滋养熏陶中，积累建构的“中国憧憬”和“中国想象”，神秘美丽绚烂，充满理想和浪漫情愫，而一旦来到中国，眼前的现实惨淡凄凉，两者之间的落差太大，打碎了“记忆”和“想象”，带来了破灭后的失望失落，负面的色彩分外强烈。第二个则是横向“落差”，即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发展落差。近代以来，中国和日本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一个是精进改革、锐意进取、咄咄逼人；一个是不思进取、腐朽衰败、奄奄一息。由此延展，也体现在社会的最表层——风俗习惯、城市环境卫生、市容市貌上。一个或可多用“落后、颓废、粗俗、脏污、贫穷”等“丑陋”的字眼来形容；一个则以其清洁爽净、安谧整饬、讲究礼仪秩序令许多国人感慨不已。从1913年到1922年在日本留学近十年的作家郁达夫(1896-1945)，在自传中屡次回忆最初踏上日本土地的难忘印象：“船到了长崎港口，在小岛纵横，山清水碧的日本西部这通商海岸，我才初次见到了日本的文化，日本的习俗与民风。”“每次回国经过长崎心里总要跳跃半天，仿佛是遇见了初恋的情人”，“在我的回忆里，它却总保有那种活泼天真，象处女似的清丽的印象。”(14)他每每感叹日本“生活的刻苦，山水的秀丽，精神的饱满，秩序的整然，回想起来，真觉得在那儿过的，是一段蓬莱岛上的仙境里的生涯，中国的社会，简直是一种杂乱无章，盲目的土拨鼠式的社会。”(15)他的某些表述或许过于极端，但却很可以说明问题。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看同一时期日本人的中国游记和中国人的日本游记，就会有更直接切近的理解(16)。

四、结构性缺陷：“中国叙事”建构中的帝国暴力

固然，负面中国的凄惨暗淡是投射在作家眼中的现实，其真伪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但另一方面，两位作家的“中国叙事”无疑也存在着致命的缺陷。那是来自于殖民帝国的一种优越感、一种强大帝国对于羸弱中国的孤傲，也是一种与之共生的话语暴力和精神暴力。

这种致命缺陷在夏目的《满韩处处》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所谓《满韩处处》，实际上并没有写韩国(朝鲜)，而所谓“满洲”也不过是“满洲”中的“满铁”，作品的实质内容是《满铁处处》。在地理学意义上，漱石确实跨海来到了“中国”的东北地区，但在“心理”层面上，在作品里，夏目依旧驻留在日本，在“满洲”的日本。他的“海外旅行”的真正动机并非要观察和了解中国或者韩国，而不过是看看“满铁”是个什么样的机构，看看“海外的日本人都在干些什么”。他参观的，是“满铁”的设施、与日本的殖民战争殖民统治有关的场所，他访问的，是昔日的本国旧友、今日的殖民统治者，他只是从“本土”日本到海外日本，从“日本”到“亚日本”，“中国”从始至终没能进入他的欲望视野。

但事实上，不管作家喜欢不喜欢，他又确实进入了中国，满目是中国风景，满目是中国人。但夏目以强烈的自觉，将自己定位于与中国人迥然不同的“异质者”，将自己与“满洲人”进行类分、进行差异化处理。我们一方面承认夏目笔下的中国现实并非虚构杜撰，然而，他对“苦力”和“车夫”的“肮脏”“邈邈”的写实描写背后，不但没有同情理解的温情，甚至缺少人间的同类意识。他捕捉感受到的不过是“奇妙”“难看”“不堪入目”“肮脏不堪”和“大煞风景”。他一再用甲午战争以后流行于日本的蔑称(“清国佬”)来称呼中国人。坐在轨道车上，驾车的中国人的“弥漫着汗臭味的浅黄色裤腿会碰到我的西装下摆，令人作呕。”乘坐马车时，朝鲜人车夫有些粗鲁，于是作者“恨不得把朝鲜人的脑袋挂起来示众。”即使是旅馆房间里“奇怪的臭味”，他也认为“那是中国人执意留下来的”，“不管爱干净的日本人怎么打扫，依然很臭。”以至于和中国人分手后，“我产生了一种终于和残酷的中国人断绝了缘分的心情，不由得高兴起来。”

就这样，夏目的《满韩处处》有意地切断自己与中国的关联，置中国于视线之外，通过对以“苦力”为代表的中国人的不屑一顾、轻蔑、厌恶和半真半假的恐怖，建构了一个孤傲矜持弱不禁风、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日本“绅士”形象，流露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精神霸权与暴力色彩，与近代日本“脱亚入欧”的时代倾向不谋而合。在这一点上，这位伟大作家几乎没能在任何一点上超越自己的时代。

芥川的情况有些不同。虽然和夏目一样，他当时也是拖着病弱的身体访华，但他所寻访的不是日本人管辖的“满铁”区域，不是遥远的“满洲”，而是中国内地，是他一直满怀憧憬和想象的中国。只是，中国的现实和他的“中国想象”相距太远，随着他的足迹在中国各地不断延伸，强烈的负面感触逐渐侵蚀其“中国像”的童话色彩。在上海一上岸，“黄包车夫”肮脏恐怖“样貌丑怪”，马车车夫鲁莽粗野；豫园的“湖心亭”“破旧不堪”，甚至有“中国人正在悠悠然地向池子里撒尿”，石板地上净是小便的痕迹；黄浦江水成“黄疸病的黄色”，长江的水则“与铁锈一模一样”；马路边上躺着乞丐，正用舌头舔膝盖伤口的腐肉，“浪漫得叫人看了要退避三舍”；拦路抢劫、卖淫猖獗、半公开的吸食鸦片，上海成为首屈一指的“罪恶之都”。杭州的西湖是“一个泥水池子”；古城苏州的文庙“荒芜”，寒山寺所在的枫桥镇“毫无特色、肮脏之极”；扬州“破旧寒酸”，令人“感到悲哀”；庐山的苦力轿夫丑陋“狰狞”，江上渔船里的人蹲在甲板上直接向江里排泄粪便；北京的天坛地坛这些名胜“荒草丛生”，时而成为处决犯人的刑场；长沙在大街上屠杀犯人，郑州马路边上的柳树挂着腐烂的头颅……这些负面场景强烈地击打了作家，正如他在扬州的伤心至极：“无论如何，却根本看不到杜牧那首名诗所咏唱的‘青山隐隐水迢迢’的意境”（《江南游记·二十三 古扬州（上）》），“现代中国已非我们日本人在中国古代诗文中认识的中国”（《上海游记·八 城内（下）》）。

随着带有古典诗文意境的“憧憬”和“想象”不断破灭，芥川感到痛心痛苦，对中国的失望等负面情绪开始发酵增殖：“我深信不疑，日本人一在中国住下，嗅觉似乎就会变得迟钝起来”（《江南游记·二十三 古扬州（上）》），“我对于中国早已腻烦透了”，“我已经不爱中国。我即使想爱她也爱不成了。当目睹中国全国性的腐败之后，仍能爱上中国的人，恐怕要么是颓唐至极沉迷于犬马声色之徒，要么是憧憬中国趣味的浅薄之人。唉，即便是中国人自己，只要还没有心灵昏聩，想必比起我一介游客，怕是更要深感厌恶的吧。”（《长江游记·一·芜湖》）芥川的恼怒和批判背后，是他作为一个文人墨客的中国情结，他渴望充满诗意的古典中国，唯其渴望过于诗意，当梦想被现实彻底粉碎时，才憎恶不休。

和夏目差不多，在大处，芥川最终没能超越那个帝国、殖民主义和东方主义具有莫大权力的时代氛围；在小处，没能超越那个有些病弱、伤怀多感的纤细日本式“绅士”。他曾想让自己的“中国之行更加贴近中国人的生活”（《江南游记·十七·天平与灵岩（中）》）；也曾经反省“我等的偏见在作祟”，“动辄使用自己固有的尺度”，“我们都不该受此种偏见的束缚。”（《江南游记·一·车中》）这一点，在夏目那里是找不到的。然而，芥川还是惯性地作了日本式绅士。

在两位作家那里，有一点是共同的：对于中国的惨淡现实，他们的写实和恼火虽然无可厚非，但目睹中国的苦难艰辛，依旧缺少一种广大宽厚的情怀、充满仁慈博爱、包容理解的心间；他们有很好的中国古代文学文化修养，但缺少洞察这个古老民族的长久历史、倾听它的脉动和倾诉、与它苦难的人民对话、去理解这个民族的过去现在以至未来的欲望和努力，更缺少思考反省近代日本这个“殖

民帝国”在古老中国衰落之因果关系中的那份责任。而这，也是近代绝大部分日本文人的共同倾向。于是，他和他们的中国之行更多的，是带有情绪化的平面记录和叙事，而没能获得并反映关于中国的更多更本质的信息，也没能给读者以震撼内心的感动。

五、结语

对于本文所讨论的两个文本，以往的阅读和阐释存在反思的空间。对作品的负面“中国叙事”半遮半掩，以简单的民族自尊情感和道德意识来裁决，缺少一些民族自省意识。应该说，近代以来的此类“中国叙事”包含了社会·历史·风俗·文化的多重信息和价值，作者的海外观察者叙事者身份及视角为我们留下珍贵的记录资料，成为一面有益的镜子。同时，如夏目和芥川的中国游记，也反映了时代和个人的局限。时代潮流的力量巨大，抗拒时代超越时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恼怒和批判不“被人尊重”远不如自省自强更重要更实用。而近代日本文人在面对中国时的集体短板——缺乏理解认知中国的强烈欲望和坚韧努力，缺乏平等意识和仁慈宽厚的情怀、缺乏锐利深刻的洞察力以及思想力，缺少一份对自己国家的批判意识，许多时候仅仅是一个体会外国风情风俗的“观光客”——则是本文想特别加以强调的。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满韩处处》和《支那游记》无法成为优秀的一流作品，即使是在日本；而外表温文尔雅的日本“绅士”也没能成为中国人的真正友人。

注释：

①日本有关《满韩处处》的研究不多，日本研究者甚至有回避的倾向。较有分量的论文，如友田悦生：《夏目漱石と中国・朝鮮—「滿韓ところどころ」の問題》（『作家のアジア体験—近代日本の陰画—』，東京：世界思想社，1992年）。《支那游记》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但总体评价不太高，后来有若干变化。代表性作品如：吉田精一：『芥川龍之介』（東京：三省堂，1942年）、武田泰淳：「中国の小説と日本の小説」（東京：『文学』1950年10月号）、紅野敏郎：「芥川龍之介△支那遊記と湖南の扇△」（『近代日本文学における中国像』，東京：有斐閣，1975年）、関口安義：『特派員芥川竜之介 中国でなにを視たのか』（東京：朝日新聞社，1997年）、吉岡由紀彦「芥川龍之介の眼に映じた中国—『支那遊記』？零れ落ちた体験」（同上『作家のアジア体験—近代日本の陰画—』）等。

②1905年，由“大阪商船株式会社”经营的大阪至大连的“日满航线”开通，“铁岭丸”（2143吨）于1906年投入运营，漱石来满洲的翌年（1910）7月22日，在朝鲜木浦湾触礁沉没，200多人遇难。

③夏目漱石：《满韩处处·四》，《夏目漱石全集7》，东京：筑摩书房，1988年。中文翻译参考了以下译本：小林爱雄著，李炜译，夏目漱石著，王成译：“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丛书之《中国印象记满韩漫游》（中华书局，2007年）。

④参照《芥川龙之介全集》第10卷（东京：岩波书店，1997年）所收《上海游记》原文，中文翻译据陈生保、张青平译：《中国游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个别字句笔者有所调整，谨向译者致谢。

“支那”一词的来源和变迁回顾：“支那”一语源于古代印度。后中国从印度引进梵文佛经，在翻译佛经时，僧人按照音译将“chini”译为“支那”。后来英文中的“china”和法文中的“chine”，均来源于古代印度的翻译。日本从江户中期开始偶用“支那”一词，至明治维新、尤其是甲午战争以后，日本不甘“居四夷之中”的中国这一称呼，而改用“支那”一词，反映了日本战胜中国之后的优越心理及对中国的轻蔑。后中国方面对日本使用“支那”称呼中国的作法表示关切，甚至进行了抵制。1930年，国民政府训示外交部：今后凡载有

“支那”二字的日本公文一律拒收。同年 10 月，日本外务省提请内阁讨论将中国的日文正式称谓改为“中华民国”。但日本民间使用“支那”的现象并无减少。直到日本战败后的 1946 年，日本政府规定，除历史性、地理性或学术性叙述之场合以外，不得使用“支那”一语，而改用“中国”。从此，支那一词，成为了日本语言中的死语。参见[日本]实藤惠秀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北京：三联书店，1983 年）等。另，笔者对近代日本最早的综合杂志《太阳》（1895-1928）进行了调查统计，确认在 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前，日本对中国多用“支那”和“清国”，以“支那”略多。《太阳》第 1 卷计 12 期的目录中，“支那”出现 11 次，“清国”或“清”出现 8 次。目前国内出版的《支那游记》的中译本均采用了《中国游记》的译名，其原因自然在于“支那”一语流行、使用的历史背景和内含的文化心理意义之中。

⑤李雁南：《在文本与现实之间——浅析日本近代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 年第 1 期。

⑥《各国人的气质》，东京：《太阳》第 4 卷第 22 号，第 232 页。1918 年 11 月 5 日。

⑦鲁迅：《随感录·三十六》，《新青年》第 5 卷第 5 号，1918 年 11 月。

⑧鲁迅：《随感录·四十二》，《新青年》第 6 卷第 1 号，1919 年 1 月。

⑨闻一多：《死水》，新月书店，1928 年。

⑩夏丏尊等：《芥川龙之介氏的中国观》，《小说月报》1926 年第 4 号。

(11)郑心南：《芥川龙之介》，《小说月报》1927 年第 9 号。

(12)秦刚：《现代中国文坛对芥川龙之介的译介和接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 年第 2 期）一文资料详实、介绍全面。本文第 3 节参考了该文，申明并致谢。

(13)丁丁：《芥川龙之介的中国堕落观》，上海：《新时代》1933 年第 1 期。

(14)郁达夫：《海上——自传之八》（1935），《郁达夫文集·第四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2 年，第 29 页。

(15)郁达夫：《日本的文化生活》（1936），《郁达夫文集》第四卷，第 156—157 页。

(16)这方面有许多第一手的历史资料可供参考，比较容易看到的，如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中罗森《日本日记》、何如璋等《甲午以前日本游记五种》、王韬《扶桑游记》、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广注）》（岳麓书社，1985 年）等。

原文出处：《浙江学刊》2012 年 3 期

“满洲之妖” 甲级战犯岸信介

近日，在辽宁沈阳一本 77 年前印发的伪满洲国新京电话簿被发现，日本早期侵华战争中的“急先锋”岸信介的联络方式赫然在列。而这个岸信介，正是现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外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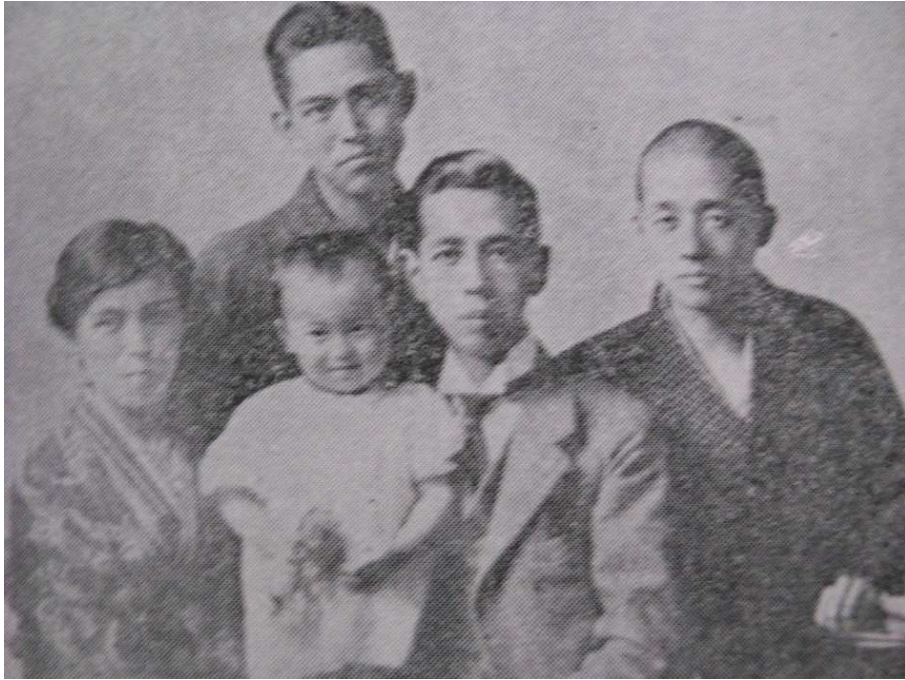


图 1 岸信介早年家族合影，前排右二为岸信介。



图 2 岸信介，1896 出生，1920 年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毕业，1936 年后赴华，历任伪满洲国政府实业部总务司司长、总务厅次长等职，和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等并称“满洲五人帮”。图为岸信介与东条内阁成员合影，二排左二为岸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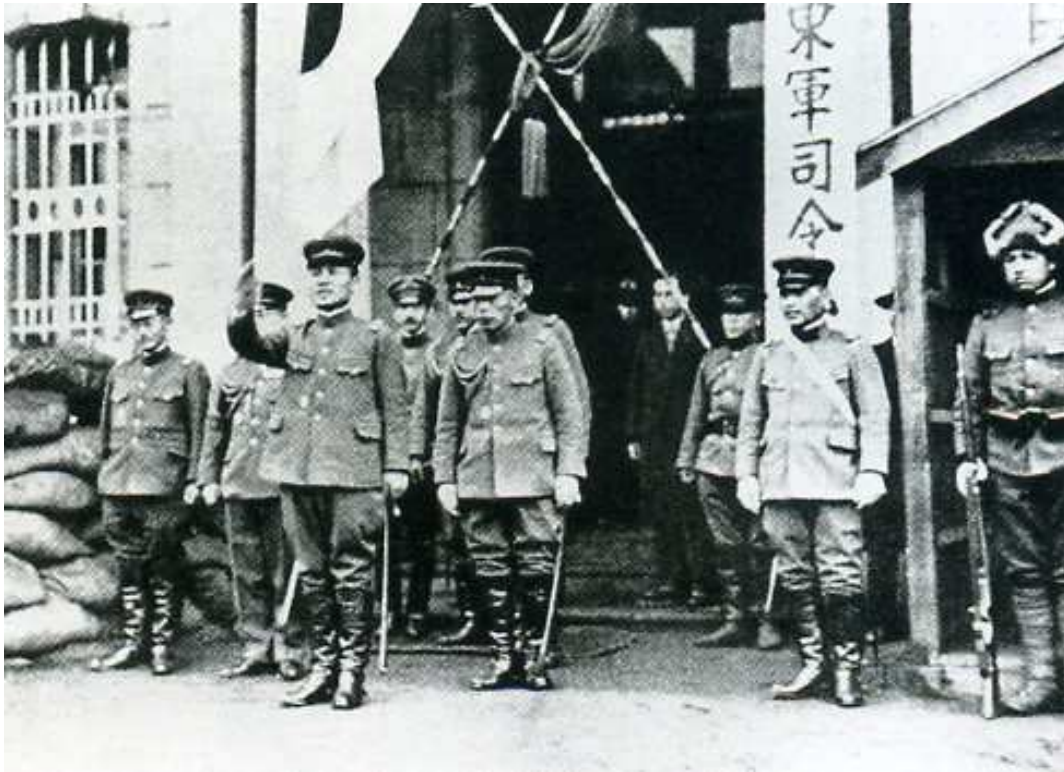


图3 岸信介在华期间生活放荡，每晚饮酒嫖妓，人称“满洲之妖”。图为日本关东军。



图4 为岸信介任职期间的伪满洲国国务院。



图5 九一八事变中，开入沈阳的日军装甲车。



图6 为岸信介任职期间的关东军司令部。



图 7 岸信介等一批日本战犯为实现其“帝国”梦想，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图为日本关东军入寇古北口。



图 8 二战结束后，岸信介被定为甲级战犯，关进东京巢鸭监狱。然而由于美国决定扶植日本的右翼政治势力，1948 年 12 月 24 日，岸信介在东条英机等 7 名甲级战犯被处死的翌日获释。图为 1961 年的岸信介。



图 9 不但如此，岸信介最终甚至重返政坛，参加内阁，甚至做到了首相。图为 1956 年石桥湛山内阁的合影，前排最左为岸信介。



图 10 为岸信介。



▲死亡した東大生榊美智子 全学連の国会突入に加わりデモ中
に死亡した榊をいたみ、学生たちは抗議集会を開いた。

图 11 1959 年 1 月，他赴美在新安保条约上签字，引发大规模示威；同年 5 月 20 日，在在野党缺席的情况下，他强行通过批准新安保条约。岸信介的倒行逆施激怒了日本民众，岸信介政府竟然出动“特别行动队”，杀害了东京大学学生领袖榊美智子，致使抗议运动升级。图为为美智子鸣冤的民众。



图 12 岸信介复出后，在日本外交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图为岸信介（左）与时任韩国总统、原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朴正熙（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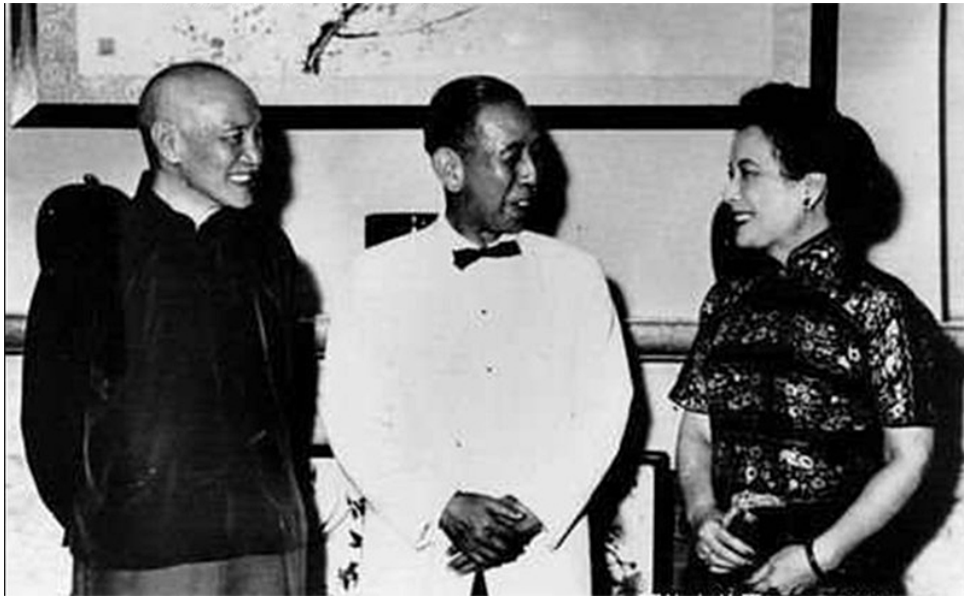


图 13 对华政策上，岸信介改善对蒋介石政权的关系，敌视大陆。1958 年，日中友协在长崎举办邮票剪纸展览，会场上五星红旗被两名暴徒撕毁，而岸信介居然称：“日本刑法关于损坏外国国旗将受惩罚的条款，不适用于中国。”此事激起了中方的极大愤慨。图为岸信介与蒋介石夫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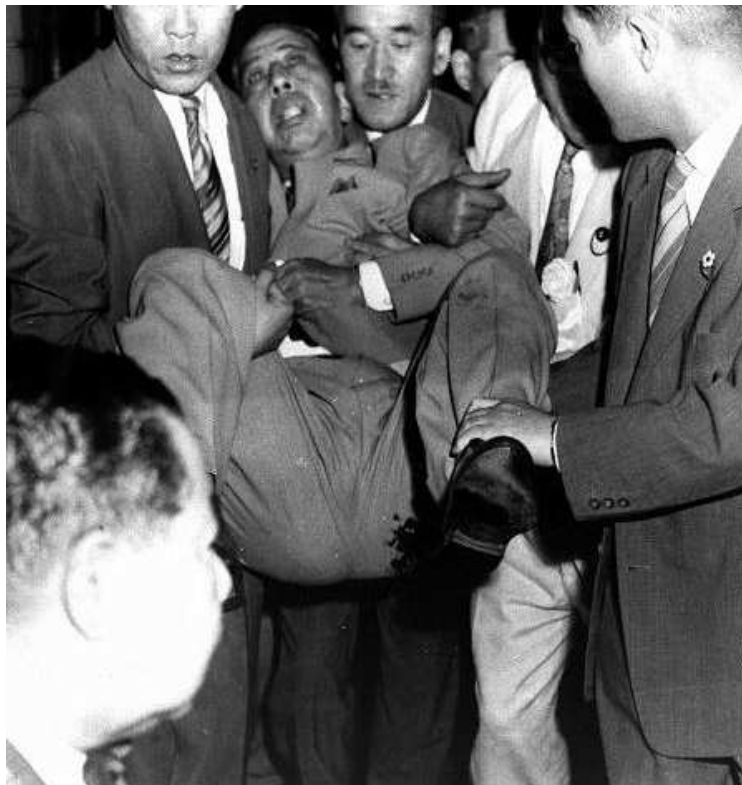


图 14 尽管右倾，岸信介亲美立场依旧引起了日本右翼极端分子的不满。1960 年 7 月 14 日，岸信介参加自民党新任总裁池田勇人招待会，被右翼团体“大化会”成员荒牧退助刺伤。同年 7 月 15 日，在舆论的压力下，岸信介被迫辞职。图为遇刺后的岸信介。



图 15 下台后，岸信介仍为自民党积极分子，到处活动。1987 年 8 月 7 日，当岸信介病死时，《朝日新闻》的社论写道：“由于被指名为甲级战犯的岸信介复出为首相，不少人认为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人无法明确追究战争责任的原因。”



1957年2月、首相に就任した祖父の岸氏に抱かれる
安倍晋三氏(右)と兄の寛信氏(左)。左端は母の洋子さん。

图 16 尽管岸信介臭名昭著，其外孙、日本现任首相安倍晋三依旧毫不掩饰自己对外祖父的钦佩。安倍在他的著作《美丽的日本》中写道：“我的政治 DNA 更多地继承了岸信介的遗传。”图为怀抱安倍的岸信介，右侧的儿童即幼年安倍晋三。



图 17 怀抱安倍的岸信介。



图 18 岸信介（右）和其胞弟、另一位日本首相佐藤荣作。岸信介旧姓佐藤，因为被收作其父本家的养子而改为岸姓。



图 19 为岸信介胞弟、日本首相佐藤荣作。因为提出无核三原则而获得 1974 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他也是迄今为止参拜靖国神社次数最多的人，多达 11 次；上台对华敌视。



保育所を訪問する岸商工大臣（木村和一さん撮影）

图 20 二战期间、1942 年的岸信介。



图 21 年轻时的安倍晋三（结婚照，安倍右侧为其妻子安倍昭惠）。



图 22 安倍晋三（前排左三）与家族成员同其外祖父岸信介遗像合影。



图 23 美国《时代周刊》上的岸信介、安倍晋三。



图 24 岸信介的对于和平宪法没有修改一直耿耿于怀。他曾说：“修宪，今后也非搞不可。搞是搞，但在我还睁着眼期间恐怕做不到了。但是，我认为绝不能扑灭这个火种！”今天，安倍晋三实现了他的梦想，日本的未来会走向何方？

资料来源：新浪图片 http://slide.history.sina.com.cn/r/slide_61_40602_49214.html#p=25

徐勇院長

李俄憲教授

鄧大才教授

趙劍英社長

劉義強教授

《滿鐵調查》中文版新聞發布會擷英

專家合影

中文版出版發行學術研討及新聞發布會

新聞發布會

鄭蘭研究員

《滿鐵調查》新書